

司馬義著

榮耀全歸鄧少平的香港前途談判

信報有限公司出版

榮耀全歸鄧小平的 香港前途談判



本文原載於信報月刊
第八卷第七期〔總第九十一期〕

序 言

1997問題終於解決了，有人額手稱慶，有人仰天長嘆，但在悠長的中國歷史中，1997問題只是無數段落的一個小片斷。日後史冊中可能只會簡單記述：「**鄧小平**領導下，中國洗脫百年恥辱，和平地收回香港主權和治權。」

榮耀全歸鄧小平，五百萬港人僅是一羣歷史過客，不過我們目睹過程中不少片斷——有擲筆三嘆之「愚忠」、有隨風擺動的牆頭草、有顛預無能之「大」人物、也有不管天翻地覆的小市民……。

千秋功過，誰來評定？

筆者希望透過這篇長文，將一些鮮為人知的真相紀錄下來，例如「**羅保**動議」其實並非羅保的；「港人治港」由港人鑄造出來；**鍾士元**兩度欲去還留；「蜜桃理論」為何失效？北京誤請「香港廠商會」；**李鵬飛**1983年10月「單刀赴京」的神秘歷程……。

目錄

頁碼

《一》	「投資者放心」以外有玄機·····	1-5
《二》	「港人治港」從何而來·····	6-8
《三》	選擇傳聲筒——錯把馮京當馬涼···	9-11
《四》	英國奸詐 議員愚忠·····	12-16
《五》	蜜桃理論枉費心機·····	17-23
《六》	鐵娘子北京行連跌兩跤·····	24-30
《七》	鍾士元演一齣「海瑞罷官」 行政局獲知談判進展·····	31-35
《八》	「你們怕甚麼？」·····	36-39
《九》	青年才俊團北上·····	40-44
《十》	被選中的許家屯·····	45-47
《十一》	柯利達「中途棄守」·····	48-50
《十二》	會談最早三個回合的爭持·····	51-55
《十三》	民意戰的台前幕後·····	56-65
《十四》	力謀港英維持聯繫·····	66-70
《十五》	英方舉手投降·····	71-74
《十六》	垂淚的聖誕·····	75-80
《十七》	英國徹底讓步 北京將信將疑···	81-82
《十八》	不是羅保的「羅保動議」·····	83-89
《十九》	兩局倫敦行看清英國人咀臉 ····	90-97
《二十》	三議員訪北京風波迭起·····	98-103
《二十一》	中英怎樣互讓互諒？·····	104-108
《二十二》	炮制大團圓結局·····	109-113
附錄	中英談判大事表·····	114-117

《——》

「投資者放心」以外有玄機

北京領導人在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1982年9月訪華後，總結了香港問題的發展，並認為香港問題是中國在英國壓力下迫出來的問題。

不過，在鐵娘子訪華前，中英雙方肯定已曾就香港問題進行了商討，例如1979年3月前港督麥理浩訪問北京、81年4月當時的英國外相卡靈頓訪華及82年1月掌璽大臣艾堅斯北上；其中麥理浩與卡靈頓會晤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後，均引述「香港投資者可以放心」作為鄧小平的主要談話內容，但實況是否如此呢？

麥理浩79年的北京行，儘管是在英國外交部的同意下進行；換言之，他是打着英國外交部的旗幟向中國提出香港問題，但中國當時根本就沒有解決香港問題的設想。加上麥理浩不過是區區一名殖民地總督，不夠身份，中國領導人本來就不把他放在眼內。鄧小平向麥理浩提出「投資者放心」和「中國在1997年收回香港」等說話，也不是中央決策，而僅是個人觀點。

到了81年卡靈頓訪華時，情況已有了改變。

81年4月3日，卡靈頓在北京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說，鄧小平「一再強調，香港的投資者可以放心。他的強調語氣，比兩年前對(香港)總督的表態更實在……(鄧小平)坦率表示，他是以中國政府的充分權力說話的」。

在卡靈頓舉行記者招待會當天的上午，鄧小平

對英國記者談話時亦曾表示，即使香港將來地位改變，香港投資者利益也不會受到損害。有關將來香港地位改變的說話，當時雖然沒有引起記者太大關注，但也是「中央決策」，是鄧小平以「中國政府的充分權力說話的」，這與79年的個人意見不同。

原來鄧小平在81年4月會見英國外相之前一個月，政治局常委曾召開會議，決定香港政策的方針及三項原則——

- 一、97年時一定收回香港主權；
- 二、要讓香港繼續為中國的經濟和政治策略服務；
- 三、在不損害中國主權的原則下，設想香港未來的政治經濟制度。

81年鄧小平與卡靈頓的重要對話

為甚麼中國要在卡靈頓訪問前的緊迫時間內，定下對香港問題的決策呢？這便要從歷史來看香港在中國領導人眼中的地位。

1949年解放軍瀕臨深圳河畔時，有人主張揮軍南下，將老牌殖民地主義者——英國人逐出香港，

1981年4月3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卡靈頓。



但中央卻持異議，國務院傳來總理周恩來的命令：「爲了中英友好關係，禁止解放軍越過深圳河。」

左派人士解釋說，周總理的高瞻遠矚，幫助中國渡過難關。他們認爲毛澤東和周恩來在解放戰爭期間，曾與極度親蘇的王明及張國燾進行多次鬥爭，慘痛的經驗，使這班革命家從心底不信任蘇聯。「留下對外口岸」的思想，使港澳兩地繼續由殖民者管治，而其後的韓戰、中蘇分裂、文化大革命和四個現代化等發展，均證明當日決策者沒有下錯判斷。

但隨着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加上中美建交和中蘇關係緩和，到了八十年代，儘管香港仍是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渠道，但昔日的戰略地位已今非昔比，故在英國三番四次提出解決香港前途問題的壓力下，政治局遂在最後時刻定出上述策略，並着令港澳辦公室負責擬定具體方案。

鄧小平81年4月3日上午向英國記者說：「十六年內或十六年後，即使香港地位有變，投資者利益也不會受損。」但他會見卡靈頓時，語氣並沒有這樣婉轉，他說中國擁有香港主權，中國從來不承認過去的不平等條約，中國解決香港問題的方法非常合情合理。

卡靈頓回答說，英國希望香港繼續維持穩定和繁榮，但香港大部分土地，按照中國從不承認的租約，十六年後將要歸還中國。

這樣的對答是否有點「牛頭不對馬咀」？這要留待讀者判斷，不過最低限度鄧小平與卡靈頓會面時，並沒有出現尖銳的衝突；事後中國領導人更認爲英國默認了中國的觀點，即中國97年後擁有香港的主權及治權。

值得注意的是，陪同卡靈頓訪華的兩位官員，一位正是日後中英會談英國代表團團長柯利達，另一位則是後來出任香港總督的尤德。

究竟柯利達及尤德日後相繼成為中英會談的要角是巧合，抑或是倫敦深謀遠慮的刻意安排呢？相信唐寧街十號的決策人才知道答案。

接見港澳人士透露香港方案特點

81年3月至年底，是中國逐漸形成解決香港問題方案的關鍵日子。但在82年1月英國掌璽大臣艾堅斯抵京安排英國首相訪華事宜時，中國總理趙紫陽除向他重申中國立場外，還透露了中國解決香港問題方案的一些具體構想，例如香港將繼續成為自由港、國際貿易中心和金融中心。

除了向英國政府透露香港方案外，北京在英國首相訪華前，亦在國內及香港進行思想工作，希望幹部及香港居民接受「一國兩制」和「特別行政區」的構思。

在81年底至82年中，鄧小平接見的港澳人士包括霍英東、黃麗松、利銘澤、費彝民、王寬誠、湯秉達、李子誦、李俠文、楊光、梁培、吳康民、陳復禮、陳紘、蘇務滋、徐四民、查良鏞及傅朝樞；趙紫陽亦接見了胡應湘、馮景禧、邱德根、李嘉誠、安子介和唐翔千。乍看這一陣容，大家可知中國的用心。綜合而言，鄧趙兩人向這些人士透露的解決香港問題的具體方案有九個重點¹。

國內方面，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和中國共產黨理論家胡喬木，同時在82年2月13日舉行的幹部會議中講了話。這個專為培訓新人而設的幹部訓練班，原名是粵閩工作座談會。

胡耀邦涉及港澳問題的談話是：「現在我們除了經濟上對外開放，還要在不遠的將來用另外一種方式，即一個國家容許兩種社會制度的方式，來解決統一台灣和收回港澳主權的問題。」

胡喬木則說：「如果我們收回香港和澳門，大批的資產階級都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它們

身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但照舊維持現行的制度，仍然是自由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這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新的非常複雜的情況，我們要有充分準備。」

中國領導人所做的大量工作，都是爲了迎接英國首相，準備和她談判解決香港問題。

- 註 1 .
- 一、中國對香港擁有主權，中國不承認不平等條約。
 - 二、香港將成爲特別行政區。
 - 三、香港現行制度不變，容許港澳繼續保持及發展資本主義制度。
 - 四、香港將來的管理工作，由屬於中國人的領導機構負責，行政首長也由香港中國人出任。
 - 五、香港政府原有機關人員，不作重大改變。
 - 六、所有工廠、商店、公司和企業，均按現行方式進行生產和商業活動。
 - 七、外資企業和外國公司，仍可在港繼續過去經營方式。
 - 八、法制、幣制基本不變，只是割斷英國聯繫，消除殖民地色彩。
 - 九、市區治安工作由警察負責，中國收回香港以後，不派解放軍進入市區。

《二》

「港人治港」從何而來？

曾幾何時，人們還爭論着「港人治港」的可行性，但到了今天，話題已轉為如何落實港人治港，因為只要你繼續留在香港，你便要接受這項安排，不過，究竟「港人治港」是如何構思出來的呢？原來這也是港人的傑作！

81年11月26日，中國五屆人大四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憲法修改委員會副主任彭真開幕時作出的修憲草案報告，對一向政治冷感的香港人來說，當然不大關注，特別是彭真刻意「貶低」草案的用意，故意轉移視線，強調草案只是針對將來台灣與中國大陸統一後的特殊情況。事不關己，香港人也懶得花精神去研究。當日提出的憲法草案規定內容為：「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

今天，大家可意識到特別行政區是香港在97年後唯一的出路，但81年底局勢未明朗時，人們普遍認為只有台灣，才會成為特別行政區。當時大多數香港人可能只關心將來坐上三個小時飛機到達台灣後，能否仍像以往一樣，只要花上三幾千塊港元，便可得到帝皇式的享受，對部分懷有某種目的的「遊客」，他們更只會留意北投屆時會否一切不變。

中國領導人從來就將台港問題，視作同一個籃子的問題，細意玩味當日彭真的報告，其實已明確表示：「在維護國家的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的原

則方面，我們是決不含糊的，同時，在具體政策和措施方面，我們又有很大的靈活性，充分照顧台灣地方的現實情況和台灣人民以及各方面人士的意願。這是我們處理這類問題的基本立場。」最後的一句話，不是清楚說明中國處理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嗎？

事實上，81年11月奉召抵京的部分香港人大代表，已獲中央授意研究一個重要課題——如何在收回主權下解決香港問題？

人大代表一語定乾坤

五屆人大的香港代表有十六人，分別是王寬誠、方善桂、石慧、莊世平、湯秉達、蘇友、李蘭生、李崧、楊光、吳康民、張泉、陸達兼、胡九、費彝民、郭增愷及黃燕芳。當然不可能每一位都有資格在中央所謂「求良方、解困難」下被徵詢意見，但從81年中開始，所有港澳人大代表都已經不斷受到中央「開導」，明白中國在97年一定要收回香港的主權和治權。

當他們在81年11月抵京準備出席五屆人大四次

王寬誠



費彝民



楊光



會議時，幾位人大代表獲得特別安排，被邀請與兩位人大副委員長級的中國領導人，在北京飯店會商一些特別問題。

當天會議上，有人提出香港不少人士抱有的疑問，究竟香港能否真正成為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香港人行嗎？在座一位以說話動聽見稱的港澳人大代表，隨即以堅定語氣說：「不是香港人行，是中國人行。解放以前，外國人不是說我們治不好上海嗎？現在上海治得好不好，大家都是明白的。我看香港跟上海沒有甚麼兩樣，上海我們可以治，香港也沒有甚麼問題，我就不相信香港的中國人治不好香港。」

無可否認，今日操縱中國政壇的，仍是那些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家，例如鄧小平、葉劍英、陳雲、彭真和鄧穎超。這些受到中國共產黨普遍擁護的領袖，私底下全是粗樸的民族主義者。共產黨崛興，這些領導人的成長，愛國主義是一個很大原動力。「不相信香港的中國人治不好香港」，這句充滿煽動性，近乎口號式的說話，深深地打動了中國領導人的心坎，當日會議認為解決香港問題的途徑正是「港人治港」。

《三》

選擇傳聲筒
錯把馮京當馬涼

1982年9月，中國總理趙紫陽向香港記者表示北京決定收回香港；兩個月後，港澳辦公室主任廖承志接見香港廠商聯合會訪問團時，首次正式闡述中國對香港問題的政策²，不過當時不少人問「為甚麼偏偏選中香港廠商聯合會來披露如此重要的政策呢？」原來這並非無心之失那樣簡單！

新華社香港分社一位社長級人員82年10月接觸香港廠商聯合會會長黃鑑時，相信這位小廠商也會情不自禁地問「為何是我？」否則他也不用在啓程赴京前，不只一次要求較有份量的商界人士（包括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李鵬飛）代他出任團長。

據筆者了解，廖承志82年11月20日接見香港廠商聯合會代表團前夕，新華社香港分社突然向港澳辦公室負責接待工作的組長提出要求，希望廖主任取消接待這個代表團，因為他們並非心目中的「傳聲筒」。究竟出了甚麼亂子？原來有關方面誤把馮京當馬涼，至於這幕政治活劇的來龍去脈，則要從港澳辦與新華社香港分社之間的關係說起。

前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第一社長王匡，在出任中國駐港最高領導人之前，僅是出版局局長。按職級，他比廖承志低幾級，因為後者當時的職銜相當於高級部長，他的下屬如港澳辦副主任李後或秘書長魯平，職位相當於副部長，比王匡高級。

加上王匡是外調幹部，而港澳辦諸位大員是中央京官，長期以來，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都是「唯

港澳辦之命是從」，這樣的關係為這次烏龍劇掀起序幕。

1982年9月，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石階摔倒之前，中國領導人原本預備向她詳細講述對港政策，但因鄧小平與英相會晤時之氣氛惡劣，而擱置起來。那麼北京如何向香港人闡述中央的決策呢？中央仔細思量後，欽點了兩個傳聲筒，一是香港貿易發展局，二是「香港廠商會」。

可怕的隔膜 可笑的誤會

為甚麼中央會作出這樣的選擇呢？原來早在1979年，前港督麥理浩訪問北京期間，中國已經向他提出了收回香港主權的構想。當時陪同麥理浩在座的，除了現時中英談判工作小組組長魏德巍（曾任香港政府政治顧問）外，另一位在座的是當時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簡悅強。在中國的邏輯下，簡悅強與香港政府是可以畫上一個等號，而香港政府與英國政府又可以畫上另一個等號，加上貿易發展局是半官方機構，選擇向貿易發展局透露其香港政策，無疑是間接向英國政府宣示同樣的訊息。

1982年11月24日廖承志會見香港廠商聯合會參觀訪問團。



當時出任貿易發展局主席的簡悅強，遂獲邀率團北上；但小廠商黃鑑，又為何獲得同樣厚待呢？

原來港澳辦的京官雖有部分曾在香港活動，但對香港情況的認識並不透徹，故此當中央要他們向香港工商界宣揚對港政策時，他們自然想到中華廠商聯合會。

可惜獲准進口中國的香港左派報章，通常將「中華廠商聯合會」簡稱為「廠商會」，而港澳辦雖想邀請中華廠商聯合會，但在通知新華社香港分社時，卻僅說邀請「香港廠商會」北上訪問；有關旨令全是上級命令下級的口脛，既沒有說明北上日期，更沒有解釋原委。而新華社香港分社亦怯於京官的威嚴與慣於服從，雖存疑惑，仍不敢多問，遂奉旨行事，將「香港廠商會」理解為「香港廠商聯合會」。一幕「錯請馮京」的活劇遂告上演！

《四》

英國奸詐 議員愚忠

1982年9月24日，戴卓爾夫人在北京舉行記者招待會時，以決斷語氣充滿責任感地說：「作為女皇陛下的首相，我完全承擔對香港人的責任。」但1984年5月中，一位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向香港新聞界表示：「前港督麥理浩在很多事情上都處理得很好，但遇上香港與英國利益有衝突時，他往往忽略了港人利益，變成英國外交部政策的執行者。」

同日，與其他八位行政立法兩局同僚在倫敦向國會議員反映香港民意的立法局議員李鵬飛，亦公開指責英國政府說：「當香港利益與英國利益有衝突時，我毫不懷疑英國人優先考慮的是英國利益。」

在「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心態下，英國人又怎能「完全承擔對香港的道義責任」？早在戴卓爾夫人訪華之前，無數所謂「履行責任」的鬧劇已不斷上演。

麥理浩禁止兩局設「97智囊團」

前港督麥理浩1979年4月6日結束訪華行程後，引述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的談話：「香港投資者可以放心。」但僅此而已，結果他日後被兩局議員稱為「香港罪人」。

麥理浩的北京行，觸發兩局議員關注前途問題。他們本來計劃在內部成立「智囊團」，研究解決前途問題的可行辦法；但這個想法一經提出，馬上

遭到始作俑者的麥理浩強烈反對，他曾從港督府跑到中區太古大廈的兩局議員辦事處「鎮壓」，禁止設立97問題「智囊團」，結果這個想法胎死腹中。

麥理浩出賣香港人的舉動，在五年後（今年1月22日，即中英就香港問題舉行第八回合會談前三天），才在英國「星期日時報」一篇報導中露出端倪，鄧小平會見麥理浩的主題是告訴他「中國要將整個香港收回」，而「麥理浩除了向他的波士」——英國政府——匯報之外，再沒有告訴其他人！

1979年底，英國政府在國會提出研究「關上移民大閘」的新國籍法案，這明顯與麥理浩向倫敦提出中國收回整個香港的報告有關。麥理浩反對兩局議員成立解決香港前途的「智囊團」，是否恐怕兩局一旦團結起來，將使英國來不及部署呢？

81年中，介乎英國下議院已通過新國籍法案及上議院將討論該法案的期間，多位行政局議員曾多次提議組團赴英游說上議院，但麥理浩再度行使否決權，反對有關提議，並堅持他本人「將完全承擔對香港人的責任」，行政局只好留在香港。結果上議院以三票之差，通過新國籍法，二百多萬持有英

麥理浩與簡悅強（左）和魏德嶺（右）1979年4月由北京返回香港時舉行記者招待會。



籍護照的港人，便淪為「二等公民」；倫敦關上這些人的太平門的「陽謀」，亦大功告成。

回顧這段歷史，麥理浩為英國政府爭取利益，居功至偉。國籍法通過以後，行政局非官守議員雖然不惜在港督府與麥理浩力爭，令「龍顏」大怒，憤而退席，但這種事後行動仍無法令歷史重寫！

這或許解釋了為甚麼麥理浩退休後，連番得到英廷的恩賜，首先晉陞為上議院勳爵，其後更獲封英格蘭最高武士勳章！

香港人多年來經政府刻意塑造下，對政治極之冷感。誰人可以喚醒港人，及早面對前途問題呢？早期在國籍法問題上，曾與英國政府作過抗衡的兩局非官守議員，應是比較理想的人選，可惜這羣業餘政客從開始便忽視英國政治現實的一面，誤信可以信賴英國政府。

簡悅強是隱瞞事實的「幫兇」？

直到83年底，當他們發覺英國政府不可信時，才明白到需要喚醒政治冷感的香港人，尋求港人的支持；因此二十多位高高在上的議員，開始由中環太古大廈跑到區議會去旁聽，可惜為時已晚。

通過新國籍法後，英國政府還將香港留英學生貶為海外學生，學費由本土生的收費改為昂貴的海外學生學費；這足以讓香港人看清楚英國政府如何「履行責任」。奈何兩局議員一貫的「愚忠」，令這羣香港精英，全部變成悶頭事實的「瞎子」。

分析兩局議員的心態，有利我們了解他們為甚麼「盲目」信任英國爭取主治權，直到83年底才醒覺。

行政立法兩局是根據英皇制誥組成的，非官守議員都是由港督委任，後者公務繁忙，絕不可能認識社會各階層和各組織的「精英分子」，故此他每次委任新議員，都採用集體決定的方式。這個「集體」除總督外，還有布政司及行政局的首席非官守

議員。

現行制度下，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還參與決定其他議員任滿後，可否再獲委任；他也是兩局內部會議的主席，故順理成章成為港府與兩局之間的橋樑；他甚至可以決定甚麼可在兩局討論，甚麼不可在兩局討論——麥理浩「禁止」兩局談「97智囊團」一事僅是例外事件——故此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一直被兩局議員稱為「大Sir」，其權力明顯凌駕其他同僚之上。

於此可見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的意向及處事作風，往往成為兩局路向的決定力量。

鍾士元是在1980年9月開始接替簡悅強為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後者一年前曾與麥理浩一起會晤鄧小平。假如我們批評麥理浩隱瞞香港人，那麼簡悅強這位首席華人又怎麼樣呢？

今年1月，當兩局議員從「星期日時報」獲悉麥理浩訪京「真相」後，曾去函簡悅強求證有關報導，但他一直沒有作答，而英國政府一直沒有公開否認「星期日時報」的報導，間接證明這篇報導的準確性，故使人感到簡悅強難辭其咎。

此外，簡悅強於79年訪京後翌年突然宣布退休，辭去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的職位，但另一方面繼續出任貿易發展局主席，而且頻頻率團出外（在80至83年3月退出發展局前，曾率領十多個代表團前赴五大洲），奔波勞碌，與「退休」相去甚遠，究竟他的引退內裏會否另有文章呢？

至於被同僚形容為「忠直倔強老實人」的鍾士元80年9月1日出替簡悅強後，也沒有給兩局帶來多大變化。這位老人家像大部分議員一樣，過分「愚忠」地相信英國政府會對香港人履行責任的承諾。

議員對現實政治缺乏認識，是「愚忠」出現的主因，但除個人因素外，也有客觀的歷史因素——

首先，議員並非民選的，他們一直均毋須向市民交代，而効忠對象也非港人，而是英女皇；其次，按照英皇制誥，議員只是總督諮詢民衆意見的特定對象，故此缺乏政治家的使命感，遇上政府意見與他們有衝突時，他們罕有據理力爭，反而只能解嘲地說：「政府有權決定是否接納我們的意見，我們只能盡責任將意見提出來。」

純提意見的做法，在處理香港日常事務一直都很有效，因為港府慣用協商替代對抗，以解決社會不同政經利益團體的矛盾；而議員提出的意見，一般都會得到政府考慮，正因為這樣，議員逐漸培養出一種信任政府的信念來。而在香港前途問題上，議員初期也是有此信念，並將之擴展至英國去。

但現實政治遠比政策諮詢複雜，香港前途問題不單直接涉及中英兩國的政經利益，而且英國政府的利益，往往又與香港不一致；故此在關鍵問題上，英國人便會犧牲香港利益以自保，兩局議員以慣用的「好人好語」工作方式來處理香港前途問題，便絲毫沒有作用。

此外，按英皇制誥委任的兩局議員，「親英形象」早已深入民心，以致後來個別議員企圖透過與中國領導人接觸，陳述香港人的憂慮時，縱使這些話是反映實況，但因出於「親英」人士之口，中國領導人也認為「這是英國人的小動作，不足為信。」結果他們的努力變得事倍功半，甚至徒勞無功。

註 2. 廖承志闡述的中國對港政策重點有五——①不遲於1997年收回香港，行使主權；②收回主權後，香港成為特別行政區，實行港人治港；③社會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法律基本不變；④保持自由港及金融貿易中心的地位；⑤保持香港繁榮和穩定。

《五》

中國不惜代價收香港
香港蜜桃理論費心機

歷史洪流不為人的意志所逆轉，多少幻想早已付諸東流，不少港人對97問題的看法亦復如此。

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82年訪華前，香港輿論界普遍對前途問題一片樂觀，他們大多認為，香港為中國提供大量的外匯收入（約佔中國外匯總收入40%），中國又怎會扼殺這隻生金蛋的鵝？於是他們估計中國會讓英國人繼續管治香港。

當時港人向英國政府獻上的計謀，包括英國首相應該要求中國在97年後續約三十年；英國應該用主權交換治權，以繼續管治香港。凡此種種，都罔顧了中國一直聲稱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事實，不知是市民對97問題無知，還是心存幻想，但可以肯定說，港人不瞭解中共以政治掛帥的特色。

1982年7月，香港觀察社委託顧問公司進行一項全港性民意調查，結果顯示70%的被訪者希望維持現狀，他們認為這是解決香港前途問題的最佳方法。調查亦同時發現，只有少於半數的被訪者關注97問題。隔膜、不瞭解、加上不關注，大概就是當時樂觀氣氛的成因。

儘管兩局非官守議員，比一般市民先知先覺，較早開始關注前途問題與港人的切身關係，但在83年前，高如行政局非官守議員也無權獲悉有關前途會談的內容及進展；立法局議員更無權涉足這個禁區。在缺乏資料進行分析之前，兩局議員也流於盲目樂觀。

83年開始，儘管行政局非官守議員爭取到獲悉會談進展的權利，但由於他們的「愚忠」，加上中英有意無意設計的「保密原則」，他們一直都三緘其口，有任何意見，只會在行政局會議廳內討論。個別的立法局議員，也只能藉着和個別行政局議員的私人關係，隱約知道一些會談進展。

嚴格來說，83年底以前，兩局議員在97問題上，一直只能各自為政，絲毫不能發揮兩局議員的集體智慧，自然亦不能策動市民，發揮社會的羣體力量。

直到83年底，當兩局知道英國決定放棄香港之後，才開始一起工作，但缺乏基本政治常識的議員們活像一盆散砂，他們從來就沒有一套較長遠的策略，難怪一位議員慨嘆地說：「兩局畢竟不是一個政黨。」

對中國立場估計錯誤

市民對中國的隔膜和不瞭解，也是議員們普遍患上的通病。他們從問題開始之初，已經錯誤估計民族大義在老一輩中國革命者心中所佔的位置。鄧

三上三落的鄧小平豈會做第二個李鴻章？



小平談香港前途時所說「不做第二個李鴻章」，民族主義情緒不是溢於言表嗎？

此外，兩局議員也將經濟利益因素看得太重。麥理浩79年訪問北京期間，也犯上相同的錯誤。82年11月20日，廖承志接見香港廠商聯合會訪問團便清楚透露：「前任香港總督麥理浩和我說過，香港每年為中國帶來四十多億美元外匯，夫復何求？但他不明白這些外匯我們不是白取的，是國內工人、農民用血汗換來的。」這一段話，說明中國對從香港取得的外匯收益，與當時港人所理解的有明顯不同。

當然，更重要的是中國老一輩當權領導人的革命情操；六十年代中蘇反目，蘇聯撤走一切在中國的經濟援助，中國欠下蘇聯大筆國債，中國還不是在最困難的時刻，拚着爭一口氣，一分一毫地還清所有欠下的債項？今天掌權的老人家也是當日的其中一班領導人！

可惜香港人一直沒有從歷史中汲取教訓，更不理解中國透過多條渠道傳出訊息的真諦。香港社會就是在這種無知下，渲染出一片樂觀氣氛。

82年初，雖然兩局議員相繼從報刊及左派人士口中，獲悉中國堅持在97年收回香港主權，並且將以撤換英人總督及改掛五星紅旗，作為體現收回主權的準則，但兩局仍認為中國提出的一套，只是作為討價還價的高姿態。

82年8月，一位立法局議員曾私下表示：「香港能夠保持繁榮，其中主要因素，是有一個國際投資者信任的行政管理制度，而英國人在這方面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香港仿如一隻在蜘蛛網上的蜘蛛，經過數十年努力，才建立起來的國際關係和聯絡，若因改變現狀而突然切斷，勢將似蜘蛛網被割破一樣，整隻蜘蛛立即會掉下來。」

香港生存要依靠國際貿易，英國人管治下的香

港政府，數十年來透過無數實際例子，在國際上建立起商人對香港的信心，將來一旦真的要組織新政府，短期間又怎能令外國商人繼續有信心與香港進行貿易呢？這種說法，在82年間，實際代表了大多數兩局議員的共同心聲。

當時，部分兩局議員還有另一種擔憂，他們認為若要撤換香港總督，在總督之下工作的一大羣外籍高官，恐怕也會相繼辭職，屆時影響最大的，將是主要由外籍人士領導的紀律部隊，香港一直都以一個強大的紀律部隊體系來維持本港安定，倘若驟然間紀律部隊失去領導指揮，是否仍然能夠有效率地工作？誰敢保證香港可以繼續維持安定呢？

儘管兩局議員對前途問題一直持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但在82年戴卓爾夫人啟程訪華前，他們卻有一個共同的觀點。議員明白到，雖然純粹從英國人的法治觀點考慮，只有界限街以北的新九龍及新界，才存在着97問題（因為界限街以南及港島地區，是割讓給大英帝國的），但他們認為香港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在考慮界限街以北租約問題的同時，必須拼入界限街以南及港島作為一個整體考慮。

而在82年8月，港督尤德親自挑選五位兩局議員前往英國，向首相反映香港民意時，議員們提出的衆多解決香港問題建議，全是希望英國在97年後繼續維持在香港的管治權，其中主要的建議，包括續約和主權換治權。

以「蜜桃理論」向大西洋基金獻媚

當年兩局議員爲了實現延長英人管治，繼續維持香港現狀，除了採用游說方法，盡量向英國政府反映香港人要求維持現狀的意願，以及每當有英國政要訪問香港時，又聯合一致反覆提出同樣的要求外，部分議員還抱有一套所謂「蜜桃主義」，那就是不斷向中英政府，貢獻一項又一項的利益，從而希

望令中英雙方覺得維持香港現狀對他們有利可圖。

82年中，香港政府向英國南大西洋基金³ 捐贈二千萬元之舉，便是議員們巧妙安排下的其中一個「蜜桃」。

當年香港政府公布立法局財務委員會通過這項決定時，馬上引起輿論嘩然。社會人士普遍認為捐款數額過多，兼且英國是一個較香港更富裕的社會，若能將捐款留下來，可以更適當地用在裨益本港社會的用途上。

82年兩局年報清楚解釋了議員當年為甚麼主動作出如此「大豪客」式的捐獻。年報說：「其他人（指支持捐獻的人士）則認為香港是英聯邦成員之一，且重視本身與英國的聯繫。英國政府既然呼籲公眾捐款，香港若對友人的求助，置諸不理，是不符香港一向的做法。」

一位立法局議員私下更坦白承認捐獻的動機，是博取英國政府的同情。他說：「雖然二千萬元的捐獻，未必完全是為了買英國人的同情，但香港市民最終還是要靠英國人幫助我們，與北京談判解決97年的租約問題。」施恩望報，乞助於英國人的心態，促成了英國政府取得二千萬元的實際收益。

港府購回天水圍並非出於自願

82年9月，政府宣布以十多億元，向中資華潤公司為首的地產集團，購回他們原先計劃在新界天水圍發展的大片漁塘沼澤地，這也是議員們刻意獻贈給中國的另一個「蜜桃」。

香港政府宣布這項決定時，出席記者招待會的官員解釋說，政府是為了繼續推行長遠發展，有需要購入大片土地作為儲備用途。砌詞冠冕堂皇，但揭穿了只是自圓其說的辯護，因為在82年政府還撥出以千萬元計的款項，聘請顧問公司研究港九新界五大區域的長遠土地發展策略；有關問題在84年中

才由政府作出最後決定。假如政府在82年爲了土地發展長遠計劃而需要天水圍土地，這套長遠計劃又是如何制訂出來呢？

一位立法局議員事後透露：「政府購回天水圍土地是一項政治交易，財務委員會根本無權作出拒絕的選擇。政府向財務委員會提出購買天水圍土地方案時，已強烈暗示財務委員會必須批准特別撥款。政府又曾向兩局議員透露，在作出購回方案之前，收到中國國務院的暗示，表示希望香港政府買回天水圍土地，從而解救華潤公司在這項發展計劃中可能蒙受的巨大損失。」

多位熟悉本港地質及土木工程的专业人士指出，政府購回的天水圍土地，是一片接一片的漁塘，淤泥堆積厚達十多米，若要發展，必先挖出淤泥，再用結實泥土填平，才可興建高樓大廈；若能完成這項龐大的挖泥填土工作，香港將在世界建築史上寫下輝煌的一頁，因為這將是現代建築史中規模最大的挖泥填土工程。

至於中英共享的「蜜桃」，則是廣東大亞灣的核電廠計劃。這個計劃可爲英國通用電力公司帶來五十億元的巨額合約，由通用公司負責供應核電廠的常規渦輪發電機組；另一方面，該計劃也爲中國提供了學習建造大型核電廠的機會。

可笑的是，分得「蜜桃」的英國通用電力公司，並沒有建造這樣規模的常規渦輪發電機組的經驗；至於製造核子反應堆的先進技術，中國將來還有賴從法國或其他西方國家引進。當然，憑着通用公司和英國保守黨政府的密切關係，贏取核電廠合約的衡量準則，根本就不是資格問題。

建造大型核電廠的科技，對中國相當重要，因爲中國的長期目標，是需要用核電來解決華東地區缺乏電力資源的問題，而大亞灣核電廠，將可以爲這個長遠目標鋪下康莊大道。當然，建造大亞灣核

電廠的先決條件，就是要香港用戶購買核電廠七成電力，從而為中國提供外匯來償還向外國購買機器欠下的巨額債項。

聯營機場胎死腹中

另一個原擬由中英共享的「蜜桃」，可惜因風不調，雨不順，而未能結出碩果。

82年初，一位立法局議員曾分別向中英雙方提交一份興建國際機場的可行性報告，建議在中港接壤的后海灣興建國際機場，由中港雙方共同使用⁴。

這份可行性研究報告除希望減輕啓德機場的擠塞情況，以及為深圳特區解決急需的對外航空聯繫之外，最重要的是為中英政府製造龐大的合作性工程合約，於此可見這位議員用心良苦。

可惜其後中英雙方互不信任，加上機場可作軍事用途，假若中英共同使用，會出現軍事上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這些理由，終於導致中英本可以分享的「蜜桃」計劃胎死腹中。

在民族主義思想籠罩下，年老的中國領導人，從來就不會，也不可能改變收回香港主權和治權的想法。另一方面，兩局議員一直巧妙地安排一個又一個甜美的「蜜桃」，除了替佯稱「履行對香港責任」的英國政府，帶來一次又一次從港人身上謀取利益的機會外，英國從來就沒有真正為香港人爭取權益。英國在談判桌上退讓之速，令中方成員也感驚訝。

部分香港人對香港前途抱有的幻想，就在現實政治下幻滅！

註 3. 「南大西洋基金」是專為照顧在82年福克蘭羣島戰役中陣亡英軍的家屬而設的。

4. 信報「政經短評」早已80年10月20日即有「橫跨中港邊界的新機場」的評論，其後曾反覆討論此一問題；見林行止著：「香港前途問題的設想與事實」頁142 / 143 及 179 / 180 等。

《六》

戴卓爾夫人訪北京
——連跌兩跤

英相戴卓爾夫人82年9月22日訪京，28日離港返英，整個行程前後僅七天，但戴卓爾夫人在北京先後跌了「兩跤」；其一是在人民大會堂門外，這一幕大家早已從電視螢幕看得一清二楚；其二則是在會見中國政壇鐵漢鄧小平時「被摔倒」，但過程鮮為人知。為甚麼英相會連跌兩跤，且被鄧小平事後向下屬破口大罵她為「臭婆娘」呢？

令鐵娘子在京碰壁的是，她在訪華期間提出「條約有效論」，這觸怒了痛恨這些「不平等條約」的中國領導人，但問題的根源其實是英國「為甚麼要提出1997問題？」

一種流行的說法認為，七十年代中以後成為香港經濟天之驕子的物業發展商，逼使港府和英國政府面對97問題。

七十年代下半期，世界經濟從73年石油危機中復甦，加上中國推行「四化」和東南亞「熱錢」注港，刺激本地物業市場興旺，樓價和地價一升再升，且成為理想的投機對象。持續的瘋狂搶購潮，把地價和樓價推至普羅市民難以承擔的水平，地產商及與地產市道關係密切的金融界，遂試圖從政治上為地產市道謀求突破。

這股操縱香港財經和金融界的龐大力量，一再向香港政府施加壓力，要求英國趁中國「務實政治」抬頭的時候，解決香港前途問題。他們希望英國在97年後繼續管治香港，因為這樣可令物業按揭期

限延長，減輕供款額，從而刺激地產市道再創新高峯。

誤會北京「金錢至上」

「中國不會放棄生金蛋的鵝」，這個信念導致英國政府認同上述見解。82年8月「經濟學人」一篇分析香港前途的文章這樣說：「英國與中國談判時，手持一張皇牌，那就是知道若果香港及港幣失去人們對它的信心，中國的損失將比英國大。中國目前每年從香港賺取七十億美元外匯，佔總數40%；相對來說，英國從香港賺取的僅是中國的七十分一。」這樣的分析，頗能反映當時英國人的看法。

當然，英國人也沒有忘記本身的利益。前英國外交部次官雷里（Sir Anthony Royle）曾私下透露，早在1974年他負責香港事務時，已經下令香港政府研究香港對英國的重要性，得出的結論是香港為英國帶來的經濟利益無從評估，也不可能將有關利益數量化，因為涉及很多無形的貿易及多種服務性收益。

戴卓爾夫人在訪華前，對香港前途抱有幻想，

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在北京「笑會」戴卓爾夫人。



這可從82年9月23日，她在會見中國總理趙紫陽前，在英國廣播電台電視訪問中反映出來。她這樣說：「中國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我想在本世紀末時，這個數字將達十二億人。……我希望能和中國討論如何確保香港穩定和繁榮，這點對中國是如此有利——以中國的外匯來說，其中40%是從香港得到的——同時香港居民生活如此美好，很多香港居民將前途付託給我們；你知道如何令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維持下去是一個迫切問題，因假若只有十五年期，你便不會為將來作投資。你也自然會希望知道較長遠的前景，而這將需要許多討論。」

於此可見，當時戴卓爾夫人認為中國為了龐大的外匯收益，會讓英國繼續管治香港至97年以後。她就是抱作這種幻想與鄧小平見面，並因此而連跌兩跤。

82年11月，廖承志接見香港廠商聯合會訪問團時，才透露英相「摔倒」的部分「精彩」過程。廖承志說：「戴卓爾夫人到中國來，口口聲聲說對香港要負責任，但除此以外，就甚麼也沒有講了。我們問她，你們負甚麼責任？她就講不清楚。我們問她，香港發行了多少港幣？她也答不出來。」

當戴卓爾夫人82年9月底在香港記者招待會上大談條約有效的同時，北京已經把她和鄧小平與趙紫陽的會談情況整理出來，供內部傳閱。內容透露，9月23日趙紫陽與「鐵娘子」會談時，雙方只是各自闡述本身立場——中國表示在收回香港主權和治權的同時，將會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英國則認為要香港維持繁榮和穩定，香港現狀一定要維持不變，暗示英國人要繼續在港負責管治工作。

而翌日上演的「鐵漢硬拚鐵娘子」長約三個小時，扣除翻譯時間，兩人實際交談大約只有九十分鐘，但已足使鄧小平達到目的。在介紹「戲肉」之前，我們先來一個小插曲。

中國領導人會見來賓前，例必有人替領導人「惡補」，譬如介紹來賓的個人資料和會見時討論項目的最新發展；而鄧小平會見戴卓爾夫人前，他也先在人民大會堂接受「惡補」。當有關人員向鄧小平談及趙紫陽與鐵娘子會談不大咬弦時，鄧小平面露不悅之色地說：「看她今天說些甚麼？」他爲了願以顏色，僅待鐵娘子進入人民大會堂後，才打開接見她的福建廳大門，並僅循例與她握手，這與趙紫陽站在人民大會堂外等候鐵娘子抵達的情況截然不同。

鄧矮子連消帶打 鐵娘子無力招架

鄧小平會見戴卓爾夫人的過程，可分作三部分——

一、略爲寒暄後，以能言善辯稱著的鐵娘子隨即單刀直入，指出中英共同希望維持香港繁榮穩定，這對中國大有好處，對香港居民也有利；爲了承擔責任，英國希望中國考慮現時香港面臨的問題，考慮新九龍和新界租約十五年期滿對投資者的影響。曾經三起三落的鄧小平，對這樣帶挑戰性的「演說」答覆得很技巧的。他用反問的方法說：「英國人對香港負有責任，請問你們負些甚麼責任？」對戴卓爾夫人代表香港人提出他們希望維持現狀的講法，鄧小平也是用反問方法來回答：「英國政府對香港是很瞭解的吧？！請問香港發行了多少港幣？」

二、鄧小平連消帶打，戴卓爾夫人爲之語塞，隨即提出「條約有效論」。她說香港的地位是中英簽訂條約形成的，如果有國家廢除這些條約，問題十分嚴重，因爲這個國家可同樣不履行其他條約。

鄧小平對鐵娘子這種提法反駁得更不客氣。他首先指出香港目前的地位，是歷史上不平等條約遺留下來的，中國從來都不承認不平等條約，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成立以後，隨即宣布廢除所有不平

等條約。對於處理香港問題的立場，鄧小平說，中國政府決定在認為適當時候收回主權，他現在「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這個決定正式告訴首相閣下；中國政府希望能夠通過外交途徑，雙方進行友好談判，尋求合作，共同制訂措施，謀求香港繼續繁榮穩定」。鄧小平補充說：「如果經由上述方式不能解決香港問題，中國政府將另作考慮。」

所謂「另作考慮」，胡耀邦83年5月會見美國華裔教授張旭成時這樣說：「鄧小平的原話是，中英如果不能在84年底以前，達成解決香港前途的協議，中國政府將單方面公布解決方案。」

三、鄧戴硬拚兩回合後，雙方同意共同擬定一份聯合公報，以便向世人交代。

戴卓爾夫人被鄧小平挫其銳氣之後，怒氣衝頂，結果在步落人民大會堂石階時失足摔倒。

鐵娘子北京之行撞得「頭崩額裂」其實是自取其咎，因她一再漠視中國發出的訊息！無辜的是香港人也險遭「沒頂」厄運。

正如上文所說，早在英相訪華之前，中英雙方早已交換看法。例如英國掌璽大臣艾堅斯82年1月會見中國總理趙紫陽時，趙已向艾闡述81年的中央決策⁵。

北京早有定論 倫敦充耳不聞

中國的立場極之清晰，究竟艾堅斯是否「偷工減料」，誤導了英國政府呢？筆者以為這個可能性不大，因為年輕時在工廠任小職員的艾堅斯，一直擺脫不掉小職員的工作方式——絕不願意對一些重要的事情單獨負上直接責任——所以當他聽取趙紫陽的說話後，立刻向趙詢問，這些說話是否適宜正式宣布？當雙方同意不作正式宣布後，艾堅斯接着又再詢問，有關內容可否作為他本人的理解而向外界透露？經仔細磋商後，最後決定以他「在北京所得

到的印象」，向外界透露部分內容。

但這位掌璽大臣82年1月10日在香港記者招待會上，故意隱瞞部分重要事實。他說：「中英之間對香港問題沒有具體協議。」當被問及中國是否對前途提出任何建議時，他也只回答：「沒有，而且我也沒有向他們提出要求。」

他又說，從他與中國領導人的接觸中，感到中國很了解香港的重要性，香港是一個自由港及自由貿易區，中國在考慮香港的未來問題時，會把這些因素算進去。但他絕口不提中國堅持對港九新界全部領土擁有主權的立場，他亦沒有向香港人透露中英雙方會在短期內就香港問題進行討論等關鍵性發展。

不過，像艾堅斯這樣小心謹慎的「小職員」性格，他又豈會不原原本本將趙紫陽的談話內容轉告英國政府？

三個月後，鄧小平也替英國人「補了一課」。當鄧小平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斯時，他詳盡解釋中國對解決香港前途所作的安排——新憲法草案第三十一條有關設立特別行政區的目的之一，是為將來解決香港問題；香港所有居民（中國人、英國人和外國人）將來都可以參加管治香港等等。當時的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後來成為中英談判的英方團長）也有列席，他對鄧小平的說話曾加以詳細紀錄，試問英國政府又怎會收不到中國的訊息？

82年6月中，鄧小平會見香港知名人士，提出「收回主權、保持繁榮」的八字真言，駐倫敦的中國大使館人員又再奉北京指令，向英國外交部作出試探說，設立「特別行政區」是否適用於香港？

種種事例說明，中國政府早在戴卓爾夫人訪華前，便透過多個場合，向英國政府詳細說出中國對香港的政策。

英國社會民主黨國會議領袖歐文1977至79年出任

英國外相期間，曾授權香港總督麥理浩於79年初前往北京作歷史性訪問，掀開了香港前途問題會談的序幕，當年麥理浩向倫敦政府作的秘密報告，歐文理所當然是主要的審閱人。憑着當年對中國立場的理解，他82年5月接受本報訪問時，亦清楚指出「你們愈將香港前途問題白熱化，只會更令中國正視這個問題的牽連性，從而強調香港是中國的領土」。歐文一語中的地指出中國對香港問題的反應，身為當事人之一的戴卓爾夫人為甚麼對中國反應估量錯誤呢？

過分自信自討沒趣

不少意見認為英國在福克蘭戰役的勝利，衝昏了英國的腦袋；她錯誤估量手中所持經濟牌的份量，加上五位兩局非官守議員在82年中向她反映「維持現狀」的民意牌，遂令這位女強人妄圖說服北京改變原有立場。

福島戰役令英國外交部兩位最熟悉香港事務的政客（外相卡靈頓及掌璽大臣兼負責香港事務的副外相艾堅斯）同告離職，相信也是英相錯誤估量客觀形勢的另一個主要理由。

戴卓爾夫人判斷錯誤致在北京摔了跤，可謂自食其果；可惜的是，部分希望英國繼續管治香港的幻想並未隨之幻滅，主要原因是港人一直被蒙在鼓裏，直到今年4月20日英國外相賀維在港首次公開英國之立場後，他們才醒悟過來。

- 註 5. 有關決策的原則如下——甲、中國對香港的立場有三——①中國對香港、九龍及新界全部領土擁有主權；②中國重視香港的自由港地位；③中國重視香港的國際貿易中心及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乙、關於將來香港地位的安排也有三個原則——④中英雙方在短期內進行討論；⑤中國的態度必定非常合情合理；⑥在作出正式安排之前，希望中英都不作任何有損香港經濟繁榮的事。

《七》

鍾士元演一齣「海瑞罷官」 行政局獲知談判進展

整個中英談判，豈只戴卓爾夫人犯上錯誤，兩局議員的「愚忠」，特別是他們早期對英國政府的「癡心妄想」，也令人擲筆三嘆！

1982年10月中，灣仔熙華大廈毆打記者事件成為新聞界的採訪焦點，隨着事態發展，報章頭版一天復一天刊登這則新聞，反而將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鍾士元突然在倫敦首相府出現的消息忽略了。究竟鍾爵士為何遠渡重洋呢？原來他赴英上演一幕「海瑞罷官」！後來經過英廷極力挽留，鍾士元才回心轉意。

這次事件的導火綫，是英國堅持香港前途會談要嚴守保密原則，連英皇制誥規定為港督最高諮詢機構的行政局，也無權過問；而遠因則是麥理浩在新國籍法問題上，「出賣」了兩局。

保密原則是戴卓爾夫人訪華時，在北京的記者招待會上提出的。她說：「如果你（指香港人）要維持信心，我必須保持機密。」當記者追問香港人在不知會談進展情況下，怎樣可以繼續維持信心時，她只能顧左右而言他地掩飾說：「如果你參加過會議，就知道不應發表會談要保密的內容。經這樣的安排後，對方將會有更多信心跟你會談。」

但筆者掌握的事實，卻顯示英國在談判桌上兵敗如山倒，「保密原則」正好用來「遮醜」。

保密原則的另一作用，是蒙蔽香港人；在對會談一無所知的情況下，港人發表意見時，難以有的

放矢，結果任由中英兩國擺布。

力促倫敦放寬保密

鍾士元請辭其實只是兩局與倫敦鬥爭的一個小環節，因為早在英相訪華前，中英雙方已常就香港問題交換文件，但行政局卻只能間中閱讀到部分文件，當時，部分行政局資深議員，已對此流露不滿。

例如82年9月27日，戴卓爾夫人在太古大廈會見兩局議員時，便上演了一幕「舌戰羣儒」的好戲。

當日多位立法局議員事前曾獲資深議員面授機宜，促使他們在會上以尖銳語氣，質詢戴夫人如何落實她在北京提出「對香港人負有道義責任」的承諾，並正面要求讓香港人——最低限度讓行政局議員——可以全面瞭解中英會談內容。

但飽經政壇風浪鍛煉的鐵娘子，又怎會輕易讓步？她當時僅模稜兩可地答允研究這個建議的可行性，並重申啓程訪華前對英國廣播公司記者所說的：「英國政府將繼續就香港前途問題諮詢香港人。」這個答案當然無法滿足兩局議員，因為他們仍然不

不甘再「被出賣」，鍾士元憤然請辭！



能知道會談詳情，在「無知」的情況下，即使英國不停諮詢他們，所能發揮的作用也微乎其微。這促使兩局議員決心向英國政府繼續施加壓力，鍾士元倫敦行正是這次鬥爭的延續！

82年12月7日，當時專責香港事務的英國外交部次官鮑斯達訪港會晤兩局議員時，一位立法局議員再度以不客氣的語調，質詢這位身材瘦削的高個子說：「閣下是否知道你目前正在處理一項關乎全港五百萬人前途的大問題呢？在處理過程中，連我們憲法內最高權力架構的行政局，也不能完全知悉香港前途談判的進展，對於五百萬的香港人而言，這種安排合理嗎？」

此起彼落，其他議員尾隨「發砲」，步步進逼鮑斯達，令這位剛在七個月前，才調往外交部的上議院勳爵，感到他接手的原來是個「燙手熱薯」！

議員「咄咄迫人」，亦令他充分體會兩局渴望英國政府放寬保密原則的決心。但這項決定是由英國首相作出的，政府官員必須嚴格遵守，鮑斯達亦不例外，因此他只能答應兩局議員的意見，盡量向英相反映。

爲了平息兩局議員，甚或可能是社會大眾對英國政府的不信任，這位飽受港人「怒言怨語」相向的英國外交部次官，在翌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提出了即時受到中方猛烈抨擊的「三腳櫬」理論。

當日鮑斯達的談話原文是「有關方面尋求的協議好比一張三腳桌子，桌子的三隻腳，分別代表中英港三方面的意願，協議只有符合三方面的意願才能成立，否則即使有任何一方不能接受協議，這張桌子也會倒下來。」

爭取「認可」協議的權利

上述談話反映這位外交部次官已經接受兩局議員的看法，明白到「香港人意願」在達成協議過程

中的重要性；而要瞭解港人意願，自然要起碼讓部分港人知悉會談的全部內容。

大約一個月後，兩局爭取的參與權利，終於獲得英國政府答允。83年1月25日，倫敦「金融時報」在一篇「香港贏得前途發言權」的報導中表示：「英國已經同意香港行政局，應該有權對英國提出建議，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有權決定是否接納英國的建議……在前途談判桌上，香港已取得獨立發言權。港督尤德不久將正式參與談判。」翌日，香港政府新聞處就此篇報導發表聲明⁸，間接證實行政局已取得會談決策參與權。

一位議員事後透露，行政局所爭取的參與權，其實是一項「認可權」(Endorsement Rights)；英國已經答允將來與中國簽署解決香港前途協議之前，先行徵求行政局的「認可」。這解釋了兩年來的中英談判，每當英國政府談判策略有重要轉變時，行政局議員都會前往倫敦，或者由英國政府派遣外交部高官來港徵詢他們的意見，這亦解釋了為甚麼在中英草簽協議之前，行政局議員要在今年9月中，前往倫敦「認可」有關文件；英國內閣也要在行政局認可後的翌日，才可以討論是否接納這份協議。

同心協力只屬曇花一現

兩局議員一反過往妥協式的好言相勸，轉為採取強硬態度，理由是担心英國重施「新國籍法」的故技——為保英國利益而犧牲香港利益。可惜的是，英國政府決定讓行政局全面瞭解會談情況這一招，令港英之間的矛盾暫時緩和下來，以致兩局議員，繼續癡信英國，誤以為英國將堅持香港人的利益，因而放軟「強硬態度」。當他們再度醒覺到英國人不可信時，回頭一望，「輕舟已過萬重山」，悔之晚矣！

有人將97問題困擾下的香港，形容為一艘在狂風暴雨中顛簸前進的小船，那麼自83年1月起，香港終於有人站到甲板上，嘗試掌舵搖櫓——鍾士元可能扮演了舵手的角色，其同僚則在旁搖櫓。

可惜這位舵手雖然剛直倔強，但他和他的船員，對中英政治的認識太膚淺，對政治鬥爭更缺乏認識，更致命的是，這三十多位船員因背景不同、輩份有別，加上部分立法局議員埋怨替行政局議員爭取了解會談內容之權利後，自己仍處身五里霧中，故有「被出賣」之感覺，結果呈現內部分裂，各懷不同目的，例如有人願意協助領航員一起工作而服從指揮；有人為鞏固自己的名位而戰；有人積極利用每一個機會積累金錢以便棄船；也有人混水摸魚，藉此「更上一層樓」。在這情況下，這艘人丁單薄、設備簡陋的小船本已先天不足，加上後天問題叢生，結果險象橫生，作為乘客的你和我應自有感受。

在香港前途問題上，兩局議員本是唯一有條件的港人領導人，但他們一再進退失據，令港人漸漸意識到他們不足依賴！

註 6. 該聲明說：「根據英皇制誥，港督在與他行使權力有關的所有重要事項上，均需要諮詢行政局，這規定將包括港督在關係香港前途談判上所負責的工作。」明顯地，這則聲明只是「掩眼法」，企圖利用存在了百多年的法律條文，掩飾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為此與英國政府的鬥爭過程。

《八》

「你們怕甚麼？」

香港記者82年9月23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前，向中國總理趙紫陽問「港人是否要為前途擔心？」趙反問說：「為甚麼要擔心呢？」

中國宣布收回香港主權和治權，是國家邁向統一的大喜訊，不少港人為甚麼還將信心問題掛在口邊？

82年6月鄧小平會見港澳人士時語重深長地說：「你們在外面的見聞比國內同胞廣泛，看問題會包括各個方面，對香港將來的問題，希望多聽聽你們的意見。」他亦強調不派幹部南下治港，反映中國領導人對保持香港繁榮的良好意願，但為甚麼香港還有信心問題呢？

82年11月30日，在北京出席五屆人大五次會議的人大代表王寬誠說：「對（香港繁榮穩定有擔心）這個問題，我想說三句話——第一句，十五年內，現狀不變；第二句，到了1997年總督沒有了，英國旗沒有了，『御用』的字眼沒有了，其他不變，社會制度不變，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交易所照樣開，跑馬照樣跑，要跳舞照樣跳。港人治港，怕甚麼？」

作為人大代表的王寬誠的談話，明顯具有傳達中國對港政策的作用；但港人難道只是擔心舞不能跳……？不少港人憂慮的是「各樣不變」能否落實？中國領導人是否了解香港情況？不知憑甚麼標準挑選出來的港澳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真的可以向

國家領導人反映香港實況？

「按經濟規律辦事」是中國近年廣泛宣傳的口號。事實上，搞經濟的人理應實事求是，才可掌握規律，但我們試看看當時中國金融界權威——中國銀行香港分行負責人兼港澳政協委員蔣文桂的言論。

蔣文桂82年11月曾就香港經濟問題，向中央領導人作過一次逾百人參加的匯報會演講。他認為香港經濟沒有受信心問題打擊；並認為自82年9月英相訪華後出現的港元下跌問題，主要是受世界經濟不景氣影響，其次是英國人施小動作。

未能正視香港情況

84年5月，香港大學經濟系教授饒餘慶在北京與港澳辦公室負責人會晤，返港以後，他感慨地說：「香港情況比較繁雜，中國解決問題的誠懇態度不必懷疑，但可能不是親歷其境吧！他們對香港情況總有隔膜……例如港幣問題，港澳辦負責人認為英國人不搞花樣，便不會出現問題。香港情況不是如此簡單，去年港元風暴，國內基本看法是英國人搞出來的。英國人可能在無意間引起港幣的不穩定

趙紫陽：「你們怕甚麼？」



，但無可否認，有很多人將港幣轉為外幣，從這方面來看，不親歷其境，很難瞭解貨幣會動盪得如此厲害。」

當然也有不少左派人士親歷其境，可惜他們帶着「有色眼鏡」，結果被偏見扭曲了事物之真象。看來有誠意建設香港的人士，都要除下「有色眼鏡」，這樣才可消除大家的疑慮。

另一方面，82年底香港流傳不少有關中英會談陷入僵局的訊息。新界鄉議局83年1月組織新界人士參觀訪問團北上時，從廖承志口中獲悉：「中國已將球踢給英國，但不知道英國交回來的球，是遠射球還是角球。」

小「三人幫」冒出頭

究竟廖承志所指的「球」是甚麼呢？原來是一個大球，而非小球；這個球是指中國一定要收回領土主權，而非外傳之方案。

當時已經瞭解會談進度的行政局議員，知道會談毫無進展。83年1月初，行政局議員羅德丞在兩局內部會議重提成立「智囊團」一事，但這項提議再度在港府強烈反對下消失於無形，兩局議員只好以私人交往或三數知己密斟的方式，思索解決香港前途的方法。

當時兩局議員認識到香港問題極之敏感，特別是83年初中英各自堅持自己立場，任何公開行動，肯定會開罪其中一方，甚至可能同時招致中英雙方聯手夾攻。一些置身其間的議員認為：「歸究到底，香港前途問題是對兩個不同政府的選擇問題。」他們當時對將「賭注」押在那一方感到非常猶豫，結果在自保心態下，大多數議員均拒絕表態。

由於行政局議員拘泥於保密原則，加上他們習慣高高在上，與普羅大眾鴻溝極大；而環顧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羅保是一位不願意得失任何人的

好好先生，但並非動盪時期一呼百應的領導；多位資深的議員，不是私務繁忙，便是與中國有密切生意往還，故此不願公開談論97問題，結果三位「中青派」的年輕非官守議員自告奮勇，成為其後兩局對外活動的最積極分子。

《九》

青年才俊團北上

提起六十年代的粵語片，相信大家還會記得**曹達華**這位「名探長」，但有多少人記得當時還有一位也是經常扮演探長的演員**李鵬飛**呢？

二十年後的今天，立法局有一位同名同姓的**李鵬飛**，其知名度甚高；他的童年是在五星旗下渡過的，目前是該局唯一持C.I.（身份證明書）的議員。究竟這位以爽朗敢言見稱的「山東漢」，在97問題的政治漩渦中，扮演了甚麼角色？

1982年中，**李鵬飛**憑着他與中國的生意關係，聯絡上新華社香港分社的負責人，當時該社曾要求他組織一個百多人的工商訪問團前往北京，與中國領導人談談香港前途問題，但**李鵬飛**以「時機並不適當」為理由婉拒了。

82年11月，香港廠商聯合會獲邀北上，**黃鑑**也曾要求**李鵬飛**出任團長，以增強號召力，結果亦被婉拒。

直到82年底，中英談判陷入僵局，新華社再邀請**李鵬飛**組團北上；這時他提出兩項先決條件——一、團員由他挑選；二、中方保證安排比港澳辦公室主任更高級的領導人會晤訪問團。

「三人幫」呼朋喚友上刀山

83年初，當兩項條件原則上獲得接納以後，**李鵬飛**隨即展開組團工作。他首先着眼於立法局「老友」，而第一個聯絡的是前「五台山」女強人**周梁**

淑怡，另一人則是以深思熟慮見稱的張鑑泉。

這個後來被兩局議員稱為「三人幫」的核心組成後，先草擬一份五十人的名單，其中包括一位行政局議員的兒子、一位公務員「女強人」及多個專業團體的負責人。經過大約一個月聯絡工作後，終於定出十二名人選⁷。香港新華社一位負責人接獲這個稱作「各界青年人士團」的名單後，曾私下表示：「我們也沒有辦法組織這樣一個高層專業人士代表團哩！」

爲了確保三位立法局議員可以順利赴京，香港新華社第一社長王匡曾去函港督尤德，聲明三人是以個人身份應邀訪京，完全不會與他們出任議員時，宣誓效忠英女皇的誓詞相牴觸。

啓程前三個月，十二名成員差不多每個周末都齊集一起，最低限度花五至六個小時，反覆研究向中國領導人提交的立場書內容。當時徐徐下跌的港元匯價，自然是他們關注的話題，爲了證明信心問題是港滙下跌主要成因，青年團曾委託一家顧問公司，爲他們分析港元弱勢成因；此外，爲了汲取以往訪京團的經驗，他們分別約見這些訪問團的成員，

才俊團的「全家福」。



瞭解情況。

擺脫親英形象，是青年才俊團另一努力克服的工作。爲了避免北京官員將他們列爲「親英派」或「上京做說客」，他們先後作了多項安排——一、出入啟德機場，故意不用貴賓室的「特殊通道」；二、返港之後，絕不依靠香港政府新聞處代爲安排記者招待會；三、事先通知香港政府不要派官員前往啟德機場迎送，避免再次出現新界人士參觀訪問團犯上的錯誤——新界人士參觀訪問團83年初自京返港時，政務司鍾逸傑親往機場迎接，並隨即接他們共進午餐聽取其匯報。此事曾引起左派頗大反感，認爲新界人士前往北京是爲英國人作說客。

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立場聲明

大家若看過青才團的立場書，相信都會覺得文字既不通順，且白字連篇；一位團員向記者解釋說，青才團十二名成員均是「番書仔」，故此，英文水平不錯，但中文程度則是「有限公司」；他們提交中國領導人的立場書，由起草至辯論，都是以英語進行，待完成後，才翻譯成中文版本呈交中國領導人。

青才團啓程前定下基本策略，準備會見國家領導人時「集中火力」，向領導人提出香港出現的信心危機；假如國家領導人承認香港出現信心危機，便提出他們的解決方案——緩衝體制。

83年5月，他們終於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習仲勛。從習仲勛在開場白閒聊客套時一再強調他與簡悅強是老朋友，可以看出儘管青才團事前曾作出種種努力，但中國領導人還是把他們視作香港政府說客，與簡悅強是同一類；直到青才團成員相繼發言，仔細和深入剖析信心問題後，習書記才見動容。

會見長達三個多小時，時間之長是過往訪問團

所罕見的。過程中，青才團八位成員相繼發表意見後，習仲勛突然不發一言地站了起來，在座者都愕然了。莫非有唐突之處，會談終止！「甚麼事呢？」習仲勛走到側門，才突然回轉頭說：「時間太長啦，大家休息一下，洗洗手吧！」

青才團5月22日返抵香港，他們履行啟程前的諾言，公開他們向領導人提出的立場書，向香港人交代他們提出的意見。不過，他們發表的，並非立場書的全文——立場書共有十四頁，但公開發表的只有十三頁！

原來在青才團準備離開北京的前一天晚上，團長李鵬飛的房間突然來了兩位港澳辦負責人——副主任李後及秘書長魯平。他們與李鵬飛和張鑑泉坦言交談至深夜，主要是要求青才團不要發表立場書的解決方案部分。

李後和魯平表示，中英政府現正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談判，中方將認真考慮他們所提的「緩衝體制」，但由於尚未到適當的發表時刻，故不希望他們洩露內容，以免中國被迫在時機未成熟時表態。日後，三位議員向兩局提交的立場書，也是刪去「解決方案」的。

立場書提出的緩衝體制是甚麼呢？為饗讀者，現摘錄如下：「由於現有兩個制度及措施有很多不同之處，我們認為『緩衝體制』的存在，一定會幫助隔離及減少很多不必要的問題。我們更希望中英雙方在友好的關係下，一方面顧及香港經濟及社會繼續發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顧及香港的特殊情形，找尋一個中英雙方都可行的道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盡快將這十四年的期限延長，便可排除1997陰影的威脅。……當這延長的時期終止時，亦即所謂時機成熟時，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已能媲美香港，況且那時香港僑胞對中國領導階層所訂下政策不變的意念一定會有深刻的認識，那時香港問題

一定迎刃而解。」

青才團的立場書，概括出專業人士對港人治港的看法與懷疑。人才外流和資金外調對保持香港繁榮安定是一種威脅。青才團赴京請願，令中國領導人開始關注香港信心問題的嚴重性；假如從這個角度評價青才團，他們北上的目的已達。

可惜青才團立場書提及的信心危機，刺中中國共產黨的要害，它提到港人信心動搖時說：「他們（指本港專業人士）並不是對在香港的中國人，治理香港的能力有懷疑，而是對中國以往政局之不安定缺乏信心。」這類將信心問題解釋為香港人對中國共產黨的不信任，是任何一個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所不能接受的。

不懂避諱頭崩額裂

一位開明的左派人士曾經這樣說：「假若國家領導人接受香港人提出的『恐共』信心問題，那不是間接否定自己的信仰？他們如何向奉行這種信仰的十億人民交代？難道真的要國家領導人在快要會見馬列史毛等人的前夕，推翻自己大半生的信念嗎？！」魏京生和傅月華不見容於中國，箇中因素亦是如此吧？！

青才團未能總結出這個結論，日後三位行政局議員北上會晤鄧小平時，也再次犯上同一錯誤——以為可以迫使中國領導人承認香港出現議員們認為的那種因「恐共」而產生的「信心危機」——結果亦落得遭人奚落的收場。

註 7. 該十二位人士分別是三位立法局議員李鵬飛（團長）、張鑑泉（副團長）及周梁淑怡，前大律師公會主席李柱銘、香港醫學會會長阮中鑾、建築師學會會長何承天、法律界人士李國能、「遠東經濟評論」記者李丁金、永安銀行董事郭志權、金鉅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主席梁國光、永安銀行總經理郭志匡及梁永鏞。

《十》

被選中的許家屯

1983年5月17日，新華社香港分社證實中共中央委員、江蘇省第一書記許家屯將接替王匡，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

83年6月30日，這位六十多歲，個子並不高大，架着茶色眼鏡，外表樸實的許社長，踏出紅磡火車站禁區後，立即被二十多名記者圍起來，連珠砲發地問問題。許家屯簡單地回答說，來香港是爲了祖國統一事業。

許家屯來港履新前，僅在79年訪問澳洲後，順道途經香港返國，以一位對香港事務全不瞭解的人士，在中英談判的敏感時刻出掌新華社香港分社是否適合？不過經過年多時間，許家屯在港的表現，已贏得中外人士一致讚賞。

王匡離職有很多傳說，但指王匡早有去意，只是中央一直沒有批准的流言最不可信。

王匡是78年夏天來港出掌新華社的。他在任五年間，惹來不少左派人士的怨言，例如他手下有一對號稱金童玉女的「愛將」，金童是後來因間諜罪服刑的羅承勳，亦即羅孚；玉女則是拍了一套「打着紅旗反紅旗」電影而聲名大噪的前左派電影明星。

1982年12月，香港五家親北京報章（文匯、大公、新晚、晶報和香港商報，簡稱文大新晶商）負責人齊齊會師北京，聽取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的工作指示。當時，有一位國家領導人當着王匡幾位下屬（左報頭頭）面前，力斥王匡辦事不力，領導無方，

稍後便傳出許家屯南下的消息。

王匡工作表現不佳，原因何在？上文有關誤邀香港廠商會北上的例子，已說明港澳辦公室把新華社香港分社作為直接下屬看待，這種北京遙控的工作關係，縱使是鄧大人南來，也難有所作為。

北京其後以中共中央委員許家屯出掌新華社香港分社，才改變這種關係——由港澳辦的直接下屬，變成「新華社香港分社專責處理香港問題，港澳辦作後勤支援」。

畢竟是官高權大，曾任江蘇省第一書記的「許第一」，與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的權位相比，雖仍有一線之差，不過後者已屬「過氣老倌」，處於退休狀態，前者則如日方中，足以彌補上述輕微差距，加上李後和魯平的地位，都在「許第一」之下。新華社香港分社遂「社」憑「官」貴，自此可與港澳辦平起平坐；許家屯辦起事來，當然也可以揮灑自如。

北京選派許家屯來港，除因他的政績卓越以外，還有一個特殊原因。事緣陳雲83年2月中在一次內部講話中強調，選派到香港接替王匡的人，必須是與

許家屯



李儲文



香港各方人士和勢力（包括中國駐港各部門），都沒有特殊關係和聯繫的人——「許家屯上任前，僅曾途經香港一次」，便成為他獲選的另一主因。

從陳雲的談話和許家屯的南下，反映北京決意重組香港左派；今年 8、9 月間新華社香港分社開始「執位」，多位舊人北調與新人（許家屯上台後才來港者）如李儲文、鄭華、陳達明和陳伯堅獲重任，間接證實上述的整頓計劃。

許家屯來港僅一年多，他的談吐應對表現出過人的機智，新華社香港分社亦呈露轉機，這有利港人改變對左派的印象，但其他的中資機構（如中國旅行社、左派銀行及華潤等）何時才效法新華社呢？

《十一》

柯利達「中途棄守」

戴卓爾夫人82年9月訪華後一個星期，港督尤德在港透露中英會談已經開始的消息；但其實雙方遲至83年7月，才正式開展會談（即第二階段會談），究竟原因何在？

原來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在鐵娘子結束訪華行程後不久，已經開始與中國外交部進行接觸，謀求中英聯合公報所稱的「本着維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的共同目的，同意（在這次訪問後）通過外交途徑進行商談」。

北京亦在82年12月調回駐法國大使姚廣，並於83年2月初，當中國領導人會見一些外賓時，透露姚廣將是中英會談的中方首席代表。

當時中英雙方應已準備就緒，但會談遲遲未見開始，有人認為主要是雙方各自堅持立場，會議無法開展，但證諸第一、二和三回合的中英會談，英方代表仍重提主權換治權的建議，反映在此之前，倫敦並沒有作出實質的讓步，而所謂彼此堅持立場，致拖延開展日期的分析並不正確。

北京外交界流行的一個解釋是，中方認為柯利達不配與中國政府「討價還價」才是主因，因為中方認為他本應十分清楚中國對香港問題的態度——81年卡靈頓、82年艾堅斯和希斯相繼訪華與鄧小平和趙紫陽會見時，柯利達每次都是座上客，中國政府一而再地談及對香港前途問題的解決政策，柯利達應耳熟能詳——但英相訪華時，雙方竟不歡而散

，柯利達肯定要負上一些責任，因為中國一直都把這位英國駐華大使，看成向英國傳遞訊息的「傳聲筒」。

柯利達其後多次向中國外交部解釋，表示中英兩國在某些觀念上可能有不同認識，因而產生衝突，兼且英國首相權力很大，作為駐華大使，他只能向英國匯報他所瞭解的情況，關於決策問題，他是無權參與的。

鐵娘子密函破僵局

怎料柯利達的解釋，不單未能冰釋前嫌，反而引起北京的更大不滿。一位領導人曾經表示：「假如他（柯利達）沒有權，我們跟他談甚麼？」

這樣的僵局持續了半年還沒突破，終於83年3月，柯利達與尤德返倫敦「班救兵」——要求戴卓爾夫人作出類似讓步的表現，謀求突破。結果鐵娘子寫了一封致中國領導人趙紫陽的密函，表示英國政府瞭解中國的立場，但認為中英兩國進行解決香港前途問題的會談，中方不應帶有任何先決條件。

83年7月1日，中英兩國終於同時宣布：「中

柯利達



姚廣



英關於香港未來的第二階段會談，將於1983年7月12日在北京開始」。四日後，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齊懷遠在新聞發布會中補充說：「中英兩國政府代表團已經組成。中國代表團團長是外交部副部長姚廣，英國代表團團長是英國大使柯利達；英國駐香港總督尤德將作為英國政府代表團成員參加會談。根據雙方商定，談判的內容是保密的。」

持續多時的僵局，終於被鐵娘子的密函打破；柯利達雖當上英方談判代表團團長，但中英在主權和治權上的矛盾，始終沒有解決；談判觸礁只是早晚問題。

《十二》

會談最早三個回合的爭持

驕陽似火的8月，使港人汗流浹背，在97問題的
低壓籠罩下，更令人難耐。

1983年8月5日（即第三回合中英會談結束後的第二日），悶熱的天氣令人煩躁，但處身太古大廈兩局議員辦公室冷氣間的三十多名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從他們各種下意識小動作，例如不斷抽煙，四處張望、或偶爾站起來又頹然坐下，也反映出他們心情焦躁。爲甚麼呢？

原來兩日前結束的中英會談氣氛惡劣，會議結束時，雙方根本不能達成聯合新聞公報；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齊懷遠在發布會上只說：「雙方在8月2日和3日舉行了進一步的會談，按計劃，將於9月復會。下一回合會談定於9月22日和23日在北京舉行。」

這明顯比第一和第二回合之新聞公報少了一些形容詞——有益、有建設性——結果使會談場外的人，也感到進展不佳。

兩局議員就是在這種心知不妙的心情下，等候尤德前來匯報會談的最新發展。

這位僕僕風塵於京港之間的英國外交官終於出現了。他向議員說，中方談判立場非常強硬，缺乏彈性；而當英國代表團提出香港人希望英國政府延續在香港的管治工作時，中方成員拒絕相信，他們只重覆中國過去所提的方案——收回主權、設立特別行政區和實行港人治港。

當議員追問爲甚麼新聞公報，沒有過去「有益」和「建設性」的字眼時，尤德先故意貶低形容詞的重要性，繼而避開正面回答地說：「會談還會進行很多次，形容詞很快就會用完，再想不到新的，因此決定減少形容詞。」

不過接踵而來的中英罵戰，以及後來被揭露出來的事實，使尤德這個「說謊者」原形畢露！北京會談場內的「火藥味」，終於觸發83年9月另一次港元風暴；這可說是82年9月第一次金融風暴的翻版。

氣氛緊張港滙江河日下

82年9月戴卓爾夫人在北京摔倒以後，中英兩國政府針鋒相對，緊張的氣氛觸發第一次港元風暴——9月20日，港元兌美元滙價還站在六·一〇的水平，但半個月後（10月5日），滙價已跌至六七〇價位，跌幅達10%。

中國每年自香港賺取的外滙佔總數四成，港元貶值一成，中國外滙收入也就減少4%；加上其他以港元計價的中外商業合同，損失數字，也就更大。

彭勵治：「噢，蔣文桂先生誤會了。」



不幸的是，中英雙方沒有好好總結第一次風暴的成因，反而變本加厲地進行「罵戰」，為第二次風暴創造條件。

正如上文指出，中國銀行香港分行負責人蔣文桂82年底在北京作的香港經濟匯報，主要是要找出第一次港元風暴的底蘊，而蔣文桂的結論是一分為二——經濟因素是世界性的搶購美元潮，其次則是英國政府在耍手法。

83年2月，港府發表下年度財政預算案時，宣布撤銷外幣存款利息稅，財政司彭勵治解釋說，政府希望進一步發展香港成為亞洲金融中心，吸引存放在外地的美元流回香港。其後雖然証實這項措施奏效，但由於政府實施取消外幣存款利息稅的同時，並沒有撤銷港元存款利息稅，左派就以此作為「英國耍手法」的「鐵証」。

胡耀邦證實談判期限

83年初港匯每況愈下，至5月中，港元兌美元電匯價跌破七算，創下新低，蔣文桂遂用署名文章，公開要求港府取消港元存款利息稅，以穩定港元匯價；這篇「綱領性」文章可算是中國銀行給港府的「第一份通牒」，但不知是無知，還是出於戰略考慮，文中完全沒有提及信心問題。

當時的政治氣氛亦頗為緊張。5月底，香港記者訪問團獲得中國外交部首次以書面形式，解答中國對香港前途的政策⁸。儘管這只是重申中國一貫的處理香港前途問題的既定政策，但白紙黑字向香港人交代還是第一次，加上答覆對象是香港新聞界，有關消息迅即在香港擴散；部分仍然眷戀英國人在97年後繼續管治香港的市民，亦開始感到幻想幻滅。

「新聞周刊」83年6月刊登一篇有關美籍華裔教授張旭成會見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文章⁹，清楚

說明中國已為中英會談定下最後期限，但港人仍看不出中英雙方何時才能坐下來談判，港人焦慮情緒日漸高漲。

83年7月1日，中英兩國終於同時宣布將於7月12日，就香港問題進行第二階段會談，這陣「及時雨」，暫時和緩香港日趨緊張的政治危機，港元風暴亦暫可解除威脅。但好景不常，六日後，尤德因聲稱他是代表香港人參與中英談判而遭到左派「炮轟」；計劃以港督私人新聞主任身份陪同尤德北上的新聞處長曹廣榮，亦被中國拒發入境簽證。結果，剛吹散的烏雲又再集結在香港上空。

接着而來的衝擊，是會談後發表的新聞公報形容詞逐次遞減。外交官員運用辭令都是深思熟慮的，形容詞的增減，自然能反映會談情況，但究竟當時的真相如何呢？

原來83年7月12日開始的第一回合會談，主要是由中英代表團團長互相交換證書，表明各自代表政府的立場；在該回合會談中，英國代表團團長柯利達向中國表明，儘管九龍界限街以南土地永久割讓給英國，但鑑於港島、九龍和新界的發展不能割裂，因此香港的未來要以一個整體來考慮。英國代表團用婉轉的外交詞令，表達出香港主權總有一天是要交還中國的。

基於英國不再堅持三條條約有效，中國代表團遂同意在新聞公報中，加上「有益」和「建設性」字眼來形容會談。

7月25日舉行的第二回合會談，英方首先提出港元的疲弱問題，試圖說服中方代表團承認香港人對前途出現信心問題；整個論調是以83年5月青才團訪京的立場書為骨幹，試圖藉此爭取延長英國政府在港的管治地位。

英國代表團的論調，觸犯了中方的大忌，中國絕對不能接受香港人因為害怕共產黨收回主權，而

出現信心危機的說法。因此新聞公報少了「建設性」，只有「有益」一個形容詞。

英國露底牌——主權換治權

六日之後，第三回合會談再度展開，英國代表團終於拿出底牌——要求以「主權」換取「治權」的方案，從而間接延續英國政府在香港的管治地位。

英國提出這套方案的理由是「港島及九龍界限街以南的土地，按照條約是永久屬於英國的，目前香港人又希望繼續維持現狀，因此，英方願意以交回全港主權給予中國，作為換取97年後繼續管治香港的權利。」

這個方案進一步刺激了中國領導人刻骨難忘的民族尊嚴，而方案的基本腔調，與一年前英國首相訪華時所堅持的三條條約有效論，如出一轍；中國代表團自然拒絕再在新聞公報中，用「有益」和「建設性」字眼來形容該次會談的情況。

第三回合會談顯示中英兩國立場仿如南轅北轍，令雙方需要較長休會時間，重新部署；可惜會談場外的「民意戰」，並沒有延長休戰時間。

註 8. 外交部聲明內容如下：「我們的一貫立場是——香港是中國的領土，主權必須收回。在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後，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由香港當地人自行管理，實行一系列的特殊政策，包括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等，以保持其繁榮和穩定。中國對香港的上述政策，將長期不變。」

9. 胡耀邦向張旭成透露：「1982年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在北京會見鄧小平時，鄧清楚表明，中英二國倘若不能在84年底，就解決香港前途問題達成協議，中國將會單方面宣布解決方案。」

《十三》

民意戰的台前幕後

港元風暴與香港前途有密切關係，這已是不爭的事實，而其觸發點，則源於會談進度不佳，雙方遂借助「外力」，以加強自己在會談場內的談判實力。基於此，香港上演了多幕明爭暗鬥的真實政治劇。

隨着第三回合會談氣氛轉壞，中英雙方開始各自發動羣衆，製造配合自己的言論，以顯示實力。英方主要依賴行政立法兩局議員，而中方則靠工聯會及其他親中團體。

率先發難呼籲港人表心迹

在知悉會談進展的行政局議員引導下，立法局議員一直都是這場民意戰的主要台前演員，他們爲甚麼甘作「打手」呢？看來原因主要有二——

一、他們與行政局議員長期共事，形成彼此對事物的看法，有比較一致的觀點；而且他們大多堅信，英國政府繼續延長在香港的管治地位，是解決香港前途問題的最佳方法，在樹立這個共同目標後，幫助行政局就等如幫助自己。

二、立法局二十多名議員，儘管部分抱着爲名爲利多於爲公的心態，但在香港政制下，他們應是政府與市民之間的橋樑；香港前途問題湧現以後，立法局議員感到有責任反映香港市民對前途的意見，一些使命感較強的年青議員遂站出來訴心聲，表達他們認爲的港人憂慮和願望，促成他們間接成爲

民意戰的闖將。

83年8月初，第三回合會談結束後，一些資深的行政局議員分別向年青的立法局議員暗示「子彈」不足，希望他們多發表意見，以便呼應會談場內的英國代表團。

8月5日，立法局議員李鵬飛率先公開批評香港人「對香港前途表態未積極」，他呼籲香港人「積極通過傳播媒介及兩局議員來表達意見」。翌日，另一位立法局議員周梁淑怡出席香港仔黃竹坑少年警校畢業會操時，強調「香港人要循正確途徑公開表達」以及「不應局限於私下的討論」，他們呼籲市民表態之意溢於言表。

中國方面當然不會袖手旁觀。8月8日文匯報首先在港聞版顯著位置刊登一篇「讀者來信」的來信，反駁李鵬飛和周梁淑怡的論調，在醒目標題「耐人尋味的言論」下，文章說：「在中英結束第二階段第三回合會談之後不久，上述言論的出現是耐人尋味的。這些言論是出自個人，或是受人所指，暫且不理，但有人想製造一種氣氛，散布對中國的不信任，則是明顯的。」從行文到用句看，這位「讀

被市民搶購一空的超級市場一隅。



者」顯然大有來頭。

信報南華早報捲入漩渦

兩位立法局議員亦不甘示弱，立即回覆文匯報，表示他們是秉承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習仲勛5月接見他們時的指導，要香港人多提意見。這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論調刊出後，文匯報隨即刊登大量讀者來信，實行大圍剿，而後期的來信重點已轉至談論「港人治港」的可行性上，實行與會談桌上中方堅持的論據互相呼應。

其後親中報章再與另外兩份報章（信報和南華早報）進行筆戰——第一場筆戰涉及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83年8月7日「微服出巡」九龍城寨的新聞；第二場筆戰源於南華早報8月17日有關百足之蟲的社論。

接踵而來的是，左派工會相繼公開表示支持中國收回香港主權和治權的政策。

另一方面，以三位立法局議員為骨幹的青才團，為了証實他們較早前向中國提交立場書中反映的香港信心危機，確實廣泛存在；他們透過自己的團員以及相熟人士，向本港多個專業團體，包括香港醫學會、建築師學會、工程師學會和大律師公會等等發出問卷，調查他們的會員有多少已計劃移民外地，或者持有隨時可以離港往外地定居的外國護照。

青才團策劃的大規模問卷調查，本來計劃公開發表，希望藉調查研究來反擊左派；不過人算不如天算，有關計劃後來觸了礁。

原來香港醫學會會長阮中鑊8月31日向報界透露了一則「驚人」的新聞——倘若香港前途談判的結果不利，本港五千多名醫生，至少有八成會設法離港——但事後遭到會員及幹事會猛烈抨擊，指責他「破壞醫生形象，令人認為醫生只懂謀取個人私利。」

經過這場風波後，公開專業人士去留抉擇的問卷結果，自然受到部分專業團體反對，青才團的如意算盤也再打不響。

不過青才團團長李鵬飛與新華社的接觸並沒有中斷，例如許家屯抵港履新雖僅短短兩個月，但已先後五次與李鵬飛會晤，談話內容自然離不開香港前途問題。當然左派人士一直將兩局議員視為親英人士，許家屯與李鵬飛的接觸，除了可視作「統戰」需要外，自然也成為左派探索英方「底牌」，找尋解決方法的途徑。

從一份未經公開的文件中，筆者得悉李許兩人曾於9月初在新華社社長辦公室，進行一次異常坦率的交談。

當天，許家屯與李鵬飛略作幾句客套的開場白後，隨即單刀直入。許說：「英國人不合作，要繼續留下來，這是不切實際的。英國人說在香港沒有利益，只是香港人希望他們留下來。現在英國人想打民意牌，這牌中方會打，亦不會輸。」

他接着說：「中國領導人不可能在97年後，容許殖民統治繼續下去，任何領導人這樣做都會垮台。現在英國談判手法就是想拖，希望香港出現經濟問題，但香港不用怕。中國可以開放中國市場支持香港經濟。」

在坦率的交談下，李鵬飛向許說：「我是立法局財務委員會成員，知道英國人不會從香港取得大利益，為甚麼中國不相信呢？」

許家屯極有自信地說：「我們不是小孩子，英國希望留下來，對英國不論經濟、政治以及外交都有好處；在經濟上，英資集團在香港有絕大的利益，例如滙豐、太古、中電和渣打都是英資大集團，難道他們不想在香港繼續發財嗎？我們估計他們是想繼續發財，所以他們是會合作的。」

這段話反映左派將英國政府利益，與香港英資

集團利益混爲一談；所以當英方在第八回合會談正式表示願意交還香港主權時，中方代表團成員不禁愕然，因爲他們一直認爲英國政府不可能在未獲取確實經濟利益之前輕易作出讓步。

許家屯評資本家不老實

接着，許家屯說出了他會晤李鵬飛的目的，他說：「我們最大任務，是對中國十億人口有交代，同時亦要向五百萬香港同胞有交代，如果不是爲了這個工作，鄧小平同志不會派我前來香港。現在可惜的，香港資本家對我們不老實，我和鍾士元都有談過，但我和他不大熟悉，他大概不明白我的意思。我和利國偉（恒生銀行董事長）也談過，他一方面在報章上勸大家不要進行外匯投機，而恒生銀行就在投機發財，他解釋這是銀行業務，但發財是他們。由今天起就讓我們一起去築一道橋，坦率地交換意見。」

許家屯接着提出一個更坦白的要求，他說：「你們最要緊的，是告訴雷斯〔專責處理香港問題的英國外交部次官，他於83年9月底訪問香港・編者〕，大家要實際合作，對各方面都會有利，不合作只能造成各方面都有害。」李鵬飛終於答允許的要求。

李許會談後不久，左派圈子就傳出李鵬飛接獲中國解決香港前途問題的建議——中國願意以「中英聯合聲明」的形式，去解決香港前途問題；而由中英雙方同時發表的聲明，內容將包括三個項目——⊖英國公開宣布，承認中國最終將擁有香港主權；⊖雙方同時聲明，香港的繁榮有賴於中英雙方共同合作以及香港人的勤奮；⊖由中英雙方表明鑑於香港環境特殊，爲了繼續維持香港的繁榮及國際自由港的地位，中英雙方同意共同合作，抹去1997年的期限，以行動證明雙方對維持香港繁榮的誠意。

上述建議以第三項「抹去1997年期限」的想法

最令人吃驚，這不是變相的續約嗎？假如成功地將中國收回香港主權的期限抹去，香港豈非與澳門處境相同？

這種提議比英國要求的續約還要寬，因為續約始終也有一個期限；而抹去期限，英國人在香港的管治地位，將可以長期持續下去，但亦可倒過來看，就是當97年限抹去以後，英國在港的十三年管治期，有可能也即時失去。但在談判桌上，中英各執一詞，上述建議遂呈露各讓一步的轉機。

不過，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鍾士元並沒有重視這個訊息，他認為這只是左派爭取李鵬飛等「三人幫」的統戰手法，希望藉着他們穩定年青專業人士的信心。

由於老大哥反應欠佳，李鵬飛只有再向「帶訊人」聯絡，希望証實有關建議確實代表中國官方的意向，以便三人可以向港督提出有關建議。可惜「帶訊人」一直沒有清楚表明有關建議是中方的「官意」，其後更不了了之。

83年9月第四回合會談結束後，上述場外接觸的一些內容被記者獲悉，並於9月30日予以披露，並指這是「北京立場將軟化」；結果迫使新華社香港分社透過一份外圍報章加以否認，而許家屯與李鵬飛築起溝通意見的「橋」亦倒塌了。

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在談判桌上態度強硬，行政局遂與港督於9月再度赴英，檢討談判立場，結果英國政府與行政局議員決定堅持原有立場——英國以主權換治權、港督須由英國政府委任。

為甚麼行政局會堅持這樣的談判立場呢？主要是由於他們平日接觸的，多是上流社會中人，後者有名有利，自然希望現狀不變，英人續治。

對英國政府而言，83年9月的談判立場，已明顯比82年9月戴卓爾夫人堅持三條條約有效論退讓了一大步；在未確實瞭解中國的強硬談判立場，是

「煙幕」還是「鐵牆」以前，英國並不打算再作讓步；從談判技巧來說，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心態不一，目標相同下，行政局議員與英國政府輕易確定第四回合的英方談判立場依然是「主權換治權」，最後底線是堅持港督要由英國委任。

不過中國的立場亦鐵定不移，堅持97年香港必須撤旗換督，實行港人治港。

希斯與兩局議員結怨

在這種「劍拔弩張」的決戰前夕，前英國首相希斯在北京會見鄧小平後途經香港。他奉勸兩局議員「接受現實」，結果演出一幕「舌戰羣儒」的「火爆劇」。

這件不愉快事件發生於83年9月12日，希斯結束訪華後途經香港；一如往常慣例，這位前英國保守黨黨魁及前首相，獲港府安排會見兩局議員。當晚的安排是希斯先與兩局議員會談，然後才共進晚餐。

怎料希斯在太古大廈的兩局議員辦事處內，一再向兩局議員解釋中國倡議「港人治港」的誠意，並勸議員要有勇氣面對現狀改變的事實。這對當時仍然極力爭取英國政府繼續管治香港的兩局議員來說，希斯的話十分刺耳，他們遂羣起與之爭辯，直到接近共進晚餐時，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鍾士元便開腔作總結，他語帶尖酸地向希斯說：「我非常欣賞鄧（小平）先生，能夠令閣下如此明白他的意見。」弦外之音是指希斯成了鄧小平的說客。

怎料此語一出，希斯暴跳如雷，馬上要求鍾士元道歉。鍾士元為息事寧人，遂如言道歉，並收回「說客」形容詞，但希斯依然盛怒未消，氣呼呼地說：「我相信我不適宜繼續留下來吃晚飯。」語畢，即與兩名隨員匆匆離去。

事後，一位與會者表示：「如果希斯現在仍當

首相，一定會出賣香港人。」但兩局議員又如何評價戴卓爾夫人呢？

上述的不愉快晚餐，後來在四位行政局議員同意下，由一位行政局議員轉告「遠東經濟評論」總編輯戴維斯，由他將事情公開，以便進一步奚落希斯。

場外連番「大戰」後，戰場再轉回談判桌上。

83年9月20日，尤德坐在中國民航頭等艙內，正準備前往北京參加第四回合中英會談；飛機另一端的經濟客位，則擠有二十多名香港記者，當他們翻閱機上的「人民日報」時，發覺內頁第六版近半的篇幅，刊出一篇令記者精神一振的文章，其標題是「中國收回香港地區完全符合國際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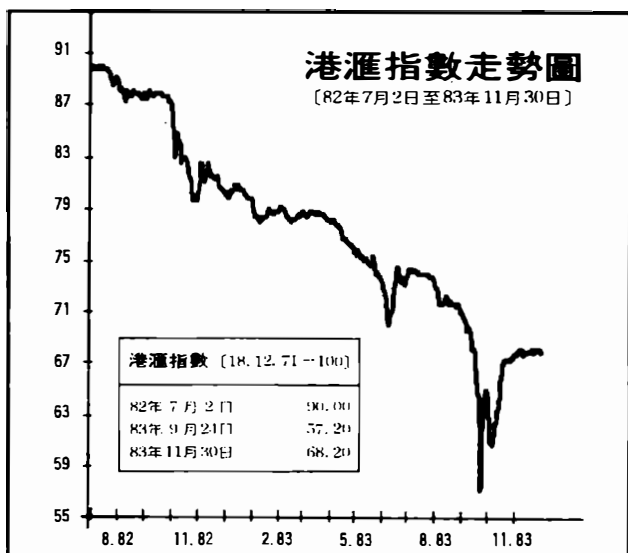
這樣敏感的文章刊在中國官方「喉舌報」，又剛在第四回合會談舉行前夕發表，自然是重申立場及向英方施壓力¹⁰。不過，正如上文的分析，英方並沒有改變立場，因此雙方衝突勢所難免。

金價暴升港元暴跌

9月22日是第四回合會談首天會議，按例仍由英方先行提出要求。當英方重提「主權換治權，港督仍由英國委任」的立場後，中方自然拒不接受。新華社遂於即日從北京發出報導，引述中國法學家張友漁的談話，再度批評英方的談判態度。報導引述張友漁說：「我國在1997年收回香港主權合理合法……企圖延長英殖民地統治主張絕對不能接受。」

中國傳播媒介連番報導態度強硬的批評言論，明顯指出中英會談進展欠佳；加上9月23日中英雙方就會談發表的新聞公報，再次沒有「有益」及「建設性」的形容詞，敏感如港人者，又怎會無反應？我們只要看看當時的港滙走勢，便可對敏感的港人加深認識。

83年9月16日以前，港元兌美元徘徊在七八三



水平，但自 9 月 17 日開始急跌，17 日跌至八〇〇，19 日八四〇，23 日進一步創八八五低價，24 日更是港人難忘的「黑色星期六」，港元兌美元急瀉至九六〇，並直迫十算關口！當日外匯市場僅上午開市，但在短短三個小時，港滙指數下挫五點五百分點，報五十七點二，為有史以來在一個交易日內最大跌幅。同日，港金也暴升，半日之間，竟然每兩漲價四百二十元，令人咋舌。

但這股狂潮並不止於此，在美元和金價暴升、港滙則劇跌的陰影籠罩下，人心惶惶，銀行固然出現「紅簿仔」的人龍，商人也即時將貨物價格調高，將港元暴跌帶來的損失，轉嫁給消費者；普羅大眾為了保障手上港元的購買力，於是爭相往超級市場搶購食糧和雜物，一時間，超級市場人頭湧湧，一般商人恐防貨物售出後，不能以同樣價格補回存貨，於是拒將新貨補回架上，弄致不少超級市場「架

空如洗」；而在油麻地的一間超級市場外，更有一些賣不到東西的羣衆，憤怒地用腳踢鐵閘，騷動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不幸中的大幸是「黑色星期六」後，有一個下午及翌日的假期作緩衝期，使政府有一天半時間安排對策。首先是在美國休假的財政司彭勵治急急返港，星期日傍晚政府新聞處亦發表聲明，引述尤德談話，呼籲「人們應拒絕聽取危言聳聽的閒言閒語」。

星期日晚上，在左派一致批評港府爲求增加談判實力，大打「經濟牌」的情況下，港府發表聲明，表示署理財政司現正重新檢討發行港元的辦法。可見在重重壓力下，政府終於撤回十天前的說話：「沒有政府能夠控制自由市場的走勢，這是國際公認的。」

9月26日（星期一），銀行公會緊急宣布加息三厘支持港元匯價，連串措施終於使港元回穩，當日的港元匯價由兩日前的九六〇高峯，回落至八四〇價位。一場可能發展成災難性風暴的危機，總算暫時平息；經此一役，會談形勢亦有新變化。

註 10. 文章的第一段指出：「英國方面通過它的宣傳工具，竟然大造輿論，說甚麼香港的繁榮離不開英國的管治，主張以『主權換治權』……在承認中國主權的原則下，由英國繼續像過去一樣管治香港，同時還進一步推行他們的『三腳櫈』理論，揚言要『尊重香港民意』……等等。」

文章接着說：「從上面所引述英國官方公開言論，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直到今天仍然站在殖民主義的立場，中心意思就是要在香港繼續進行殖民統治。這不僅違背歷史潮流，在法律上也站不住腳。」

文章最後稱：「我們希望英國政府能夠認清時代……同中國方面通過友好的談判，圓滿解決香港問題。」

《十四》

力謀港英維持聯繫

83年9月26日的信報「政經短評」說：「港元匯價江河日下，導致百物騰貴是無可避免的……如果港元未能受到及時有效的遏制，治安日劣甚至帶來某種程度的社會不安，是可以預期的。令我們十分痛心的是，在這個最需要中英攜手合作的時候，雙方唇槍舌劍的『言文攻勢』竟然升級。」這一篇題為「痛心之事，莫此為甚」的短評，刻劃出香港人當時的憂慮心情，可惜各自聲稱「代表香港人利益」的中英雙方，並沒有因為港元風暴而收斂針鋒相對的言論。

9月28日，主管香港事務的英國外交部次官雷斯結束訪港行程前舉行記者招待會，他說：「中國政府對英國的立場作出公開評論，對於找尋解決方法的共同目標並無裨助，這是於事無補和令人憂愁的。」這位英國外交部次官，也直接批評中國訂出84年9月為中英會談期限「顯然會弄巧反拙」。

中國當然不甘被英國政府單方面攻擊，10月3日，中國外交部透過新華社發表談話，點名批評戴卓爾夫人¹¹和雷斯；翌日，新華社評論員進一步闡析外交部發言人的論據。

10月6日，「人民日報」再以「雷斯先生可以休矣」為題，撰文批評雷斯9月28日在香港記者招待會上的談話¹²。

透過這三篇文章，我們可見中國會不惜犧牲，也要收回香港。這樣堅定的立場，逼使瞭解會談情

況的行政局議員面臨一個痛苦抉擇——假若堅持以主權換治權，會否導致談判破裂，令十三年安穩的過渡期也不保呢？

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羅德丞10月25日出席一個餐會時，曾隱晦地描繪議員內心的矛盾鬥爭；他說：「若香港政府對在北京進行的香港前途會談的結果有影響力，則須設法均衡一套非常複雜和互相矛盾的利害關係。……有能力離開香港的人，可能希望盡量延長現有環境，他們不願為較好的將來而犧牲現在的繁榮。那些珍惜自由但不能離開的人，則會希望永遠確保能為自己和子孫保持已慣於享有的自由，即使犧牲現有繁榮，亦在所不惜。」

聰明老練，在兩局中有「橋王」稱號的羅德丞，當然不會較易公開表態；他只是說：「確信將來得到一個可被接納的解決辦法。……香港若一蹶不振，長遠而言，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

行政局議員83年10月5日第三度赴英，與英國共商解決的，便是「如何均衡非常複雜和互相矛盾的利害關係」，以便重新部署第五回合會談的英方立場。

羅德丞

雷斯

李國飛



另一方面，上文提及左派人士向李鵬飛建議「抹去1997年期限」的想法被新華社否認後，李鵬飛於10月6日在香港商人王劭興陪同下前往北京，再來一次「朝聖」。有關「邀請」來自中國統戰機構，且有一項條件，就是規定李鵬飛不得將是項邀請轉告新華社香港分社，而李的行程、食宿和機票，全由中方負責。

李鵬飛10月6日踏足北京機場後，隨即被送往北京景山公園附近一幢傳統的中國「四合院」樓房，該處幾與外界完全斷絕聯絡，接見他的中國官員，竟是前外貿部長李強及國務院公安部負責人童申。

在北京逗留期間，李強和童申多次重覆中國對香港的態度，又勸喻李鵬飛不要做李鴻章第二；由於李鵬飛反覆提出他相信當時香港面對的信心危機，雙方始終「不咬弦」；李鵬飛從香港携往的「倡議書」，也一直沒有機會提出來討論，他終於10月9日離京返港。

至於那邊廂的尤德與行政局議員們，於10月7日在倫敦會見了戴卓爾夫人。首相府其後發表聲明：「這次會晤為有關香港前途會談的事項，帶來徹底的了解。……各大臣重申英國政府的目標，是要尋求一項獲國會、中國和香港人接受的解決方案。……對此次有機會進一步和首相及各大臣會晤，以及英國政府繼續對香港作出承諾，香港總督和各非官守議員均表示高興。」

行政局議員為甚麼高興呢？原來會上英國內閣的最高層人士，包括首相和外相，均承諾繼續在談判桌上，向中國爭取英國在香港的統治權（Continuation Of British Administration）；英國代表團改變的，只會是不同的爭取手法，即一種策略上的改變——由第四回合會談明刀明槍要求以主權換治權，改為要求香港與英國保持聯繫；這亦是10月底戴卓爾夫人接受英國廣播公司海外電話訪問

時所提的「英國聯繫」(British Link)。原初英國政府與行政局議員的設想，是希望藉「聯繫」一詞，迴避中國對收回香港主權的強硬態度。

銅牆鐵壁闖不過——改變策略

由於無法估計中國對英國上述新立場的反應，爲了避免再次出現對抗性衝突引起的震盪，香港政府遂在第五回合會談舉行前夕，於83年10月15日宣布由10月17日開始，實施指導性滙率制度，將放棄十多年的「固定滙率發行紙幣」方法，重新施行。此外，政府又撤銷港元存款利息稅，以便加強市民對港元價值的信心。

一切部署妥當後，英國代表團遂在第五回合會談中，提出香港與英國保持聯繫的建議。當時英國與行政局議員同意的談判底線是：「不反對97年後港督由中國委任，但交換條件是設立副總督職位，並由英國負責委任；藉此令97年後的香港仍和英國保持一定的聯繫。」

中方對英國突然由「堅持主權換治權」轉爲只要求「英國聯繫」深感詫異，故此中方代表團沒有在談判桌上即時反對英方此項建議，反之，中方談判代表團團長姚廣表示願意考慮。

由於中方認爲英國談判態度轉軟，第五回合會談結束後，新聞公報也再次出現「有益」和「建設性」等字眼。

中國沒有即時拒絕英方提出「英國聯繫」的建議，對剛經歷港元風暴的行政局議員，自然是一大喜訊；最低限度這是繼續英國在港管治權的「一線希望」。爲了確保中國完全明白香港與英國保持聯繫的重要性，議員們在場外的配合工作，再度出現。

第五回合會談結束後的第五天，羅德丞在一個午餐會上，解釋香港與英國保持聯繫的重要性¹³。

83年10月31日，也是中英第六回合會談舉行前

的兩個星期，戴卓爾夫人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海外長途電話訪問時，亦提出97年後，希望香港能夠繼續與英國保持聯繫。她說：「維持香港的繁榮安定以及令香港人接受的生活方式，與英國保持某種形式上的聯繫非常重要。……未來的聯繫性質是甚麼？法律的性質是甚麼？這些都是談判桌上的問題。」

儘管戴卓爾夫人以保密理由，將「聯繫」實際意義含混過去，但英方談判立場，至此已清晰可見。英國政府其後的表現又如何呢？

- 註 11. 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9月23日對美國記者發表態度強硬的談話說——①港元和港股暴跌是投資者失卻信心引起的，失信心是因為政治前景不明朗，1997年以前，香港資金會進一步撤出；②不應指責英國推行殖民主義，英國沒有從香港拿走過一個「便士」；③如果不是香港的特殊地位，香港早在數年前已經獨立，香港早已是另一個新加坡。

至於中國外交部發言人10月3日的評論如下——最近英國政府負責人士，接連就香港前途問題發表不恰當的談話，已引起各方的嚴重關切。……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是中國政府堅定不移的方針。……英方負責人接連發表不恰當的談話，只能增加談判的困難，而無助於問題的合理解決。

12. 該篇文章說：「如果英國把中國所抱有的使香港問題得到妥善合理解決的誠意和合作態度，看作軟弱可欺，頑固堅持錯誤的立場，中國當然不能長期等待下去。雷斯在會談的『最後期限』上做文章，顯然是低估了中國政府和人民收回香港主權和管理權的決心。」
13. 香港十分依賴製造業的出口貿易，出口貿易十分依賴各種國際協議。香港能夠參與這些國際貿易協議，只因為是英國屬地。……香港與英國的法定聯繫一旦斷絕，香港在這些協議下享有的權利便會自動消失。例如香港和新加坡一樣成為獨立地區，便會立刻失去數百項國際貿易協議給予的權利。當然，日後還有可能訂立新的貿易協議，但香港的競爭對手，必定會設法令香港失去多年來建立的優勢；此外，香港會失去入口權和在國際貿易及一般關稅總協定下享有的最優惠國地位。

《十五》

英方舉手投降

英國駐華大使伊文思去年11月中旬接替柯利達之前，抵港訪問。他在一次與工商界人士晚宴後，半帶醉意地向與會人士提問：「你們的最低要求究竟是什麼呢？」這個問題即時引起紳商名流一陣騷動，他們立即揣測伊文思酒後吐真言；他的問題背後可能是英國準備在談判桌上進一步讓步。

伊文思憑着多年職業外交工作累積的警覺性，即時明白自己說溜了口。他只好牽強地說，英國沒有退讓的意思，只是想聽取意見。不過這個小故事確實反映出英國「無心戀戰」的心態。

早在中英第五回合會談結束後，英方已有意完全放棄開始時的強硬態度。83年11月初，一位英國外交部高級官員曾私下承認，解決香港問題的主要工作，應該是如何確保香港現行運作方式得以延續下去。

他指出：「最佳的（Ideal）解決方法是讓英國繼續管治，香港社會整個運作方式便可以延續下去；但鑑於中國在會談桌上態度強硬；次佳的（Second Best）安排，是將現行香港社會運作方式，一一加以記錄，經中國同意後，便可確立下來，使香港真的『制度不變』；例如，將未來治港的港人權力明文界定下來，就有希望減少將來那位治港的港人權力過大情況的出現。這個次選的安排，建基於一個信念——相信中國會遵從協議辦事，因而希望將來香港可以藉着明確的規範，真正成為『港

人治港」。」

這位能夠直接瞭解中英會談情況的外交家還說：「過往紀錄，中華人民共和國遵守與外國政府簽署條約內容的紀錄非常良好的。記憶中，只出現過一次毀約事例，那是和日本簽署上海寶山鋼鐵廠計劃合約後，適逢中國調整大型發展計劃的步伐；因此再和日本重新談判，簽署新的協議。」

試探中國是否虛張聲勢

這位權威人士又表示：「英國退至第二個選擇之前，必先嘗試堅持第一個最佳選擇，希望能夠真正試探出中國的強硬立場，究竟是煙幕，抑或是一堵無法穿越的堅硬磚牆。」

從這位高級外交官員的說話，可以清晰反映英國政府早在真正作出試探以前，已經有再作退讓的安排；而英國答允替行政局議員爭取港英之間保持一定的「聯繫」，其實只是一項「測試」，看看中國的談判態度是否真的十分強硬罷了！

這種隨時作出讓步的部署，兩局非官守議員當中，立法局議員肯定毫不知情。83年11月11日中午

伊文思



戴宏志



馬德克



，中區太古大廈兩局議員辦事處內，就在這種毫不知情的背景下，上演一幕充滿火藥味的「審官記」。

83年11月7日，一篇來自倫敦的報導透露英國外相賀維在一個私人宴會中，談及英國參與香港前途會談的目標是「保存將來的香港，能夠成為一個在共產主義背景下的自由西方式經濟體系¹⁴。」其中「在共產主義背景下」的語句，最令議員們深感不安。

11月11日，一般事務司戴宏志及副政治顧問馬德克，在兩局議員辦事處主持每周一次的兩局內部簡報會，充滿焦慮的兩局議員向兩人展開連串追問，尖銳地質詢英國是否準備雙手將香港讓給中國？

這兩位官員除了說「無可置評」（No Comment）以外，無法提出任何可以消除議員疑慮的合理答案。部分立法局議員開始懷疑英國政府了！他們懷疑英國可能為中英長遠的良好關係，及其帶來的巨額政經利益，而在談判桌上迎合中國的要求。

英國是否為了本身利益，作出「出賣」香港人的行為，這件歷史公案，只有留待歷史學家考證，不過，11月14至15日舉行的中英第六回合會談，卻明顯是英國談判態度轉變的分水嶺。

在第六回合會談首天會議上，中國以主權和治權不可分為理由，否決英方提出的「英國聯繫」；英方的反應是希望延長會議中段休息時間。經過三十分鐘商議後，英國代表團突然要求中方正式提出有關97年後管治香港的方案。

英國代表團當時提出這項要求的理由是，中國領導人一再向訪京的香港團體提出各種「港人治港」想法，為何不將之正式在談判桌上提出；其後，中國答允英方要求，詳細列出「港人治港」構想中的具體方法，這也是香港傳播媒介流傳的「十二點方案」。

不過，站在中方立場來看，英方對中國收回主

權和治權的態度仍然十分曖昧；文匯報就在83年11月26日，以「聯繫之說，用意為何？」為題，發表社論，批評「英國在談判桌上並不願意痛痛快快放棄香港的主權和治權，所改變的只是談判的技巧和策略」。

該篇社論又說：「如果戴卓爾夫人的所謂『聯繫』真是所謂『共管』，那是完全打錯算盤了，中國已再三聲明，香港的主權和治權不可分割。所謂『治權』，即是管理之權，中國恢復香港主權後，又怎麼可以將它一部分治權再讓給英國？英國又怎麼可以要中國讓給它一部分治權？這不是又回到香港主權上去了嗎？戴卓爾夫人還不是調換了另一個方式，堅持過去的不平等條約？」整篇文章的論據，與中國代表團在談判桌上講話如出一轍。

爭取次佳方案 形勢急轉直下

當然，中國代表團也感覺出英方準備退讓的態度。中方代表團一名成員便曾這樣表示：「英國人要求我們提出治港方案，便是希望『打退堂鼓』。」

第六回合會談結束後，英國代表團已達成一致的結論——中國對香港主權和治權的強硬態度不是煙幕，而是難越雷池半步的磚牆。

根據這個結論，英方遂轉而希望知道「港人治港」有什麼內容；因為第一個目標既然不能達致，英國爭取的將是次佳選擇——「一份詳盡而有約束力的協議」；瞭解治港方案，便是為這個目標而作好準備。

自83年7月開始的第二階段會談，經過六回合會議後，英方終於找出結論，並且標誌着談判形勢急轉直下。

註 14. 原文為 "To Preserve Hong Kong's Future As a 'Liberal Western-style Economy In a Communist Setting' "

《十六》

垂淚的聖誕

英國是在83年12月7至8日舉行的第七回合會談，正式決定在97年後放棄香港的主權和治權。當時英方代表團所用的辭令是：「英國願意有條件地在1997年7月1日，將香港主權和治權交還中國。英方的條件是要中國履行過去的承諾，確保實行『港人治港』方案，包括保證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在97年後維持五十年不變。」

對於英方的急速退讓，中方也感驚奇。驚喜之餘，中方談判代表團成員兼新華社香港分社第二社長李菊生，83年12月9日在北京款待到京訪問的香港觀察社成員時，便曾情不自禁地說，香港主權問題，在剛結束的第七回合會談中已經解決。但香港人被蒙蔽至84年4月20日，才從賀維口中獲悉這個重大決定。

中方在驚喜之餘，同意在第七回合會談結束後的新聞公報，除了以「有益」和「建設性」來形容會談情況外，還打破慣例地說：「雙方回顧了會談的進程和迄今為止所取得的進展。」深思熟慮後寫出來的「外交」新聞，當然字字珠璣，中方同意用上「進展」兩字，顯示會談已經出現突破。

會談既然解決了最關鍵的主權問題，早已準備退休的英方團長柯利達，自然可以一償夙願，他的遺缺也由較低級的外交部助理次官伊文思出替。而中國代表團也同時作出相應安排，由外交部部長助理周南，接替副部長姚廣出任中方代表團團長。

至於會談有突破的詳情，當時只有一小部分幸運兒知道。這些幸運兒除了行政局全體非官守議員外，還包括立法局非官守議員。

尤德在83年聖誕前夕的一次行政立法兩局內部會議中，以他一貫呆板沉實的語調，說出令全場震動的消息；他說：「英方談判代表團已經達致一項結論——『爭取延續英國統治』的談判目標，已經無法達致，必須放棄。」議員聞訊，全場鴉雀無聲，有人目瞪口呆，也有人即場垂淚。

本刊今年2月揭露了該次重要會議的內容後¹⁵，部分兩局議員還拒絕向報章交代。下面是84年1月31日「東方日報」的報導，標題為「英國撤出香港，議員紛說不知」，內文為，「行政局議員、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羅保表示，並無英國或港府高官向兩局透露會於97年後，撤出香港一事。……李鵬飛又稱，雖然他於去年12月離港赴美，但隨後翻查會議紀錄，却不覺有港府高官透露談判風聲，故難以証實此報導的真實性。……吳樹熾議員拒絕就該項報導加以評論。陳英麟議員亦表示從未聽過有關傳聞。」

尤德愧對香港人？！



看來比較聰明的還是政府新聞處；在當天「東方日報」的報導中，又有如下一段：「關於是否曾有一名港府官員在去年底向兩局非官守議員透露英國轉變了談判立場，發言人未有正面答覆，僅表示港府官員經常與兩局非官守議員開會，就一些問題交換意見。」這位政府發言人太極手法之高，可謂登峯造極，他既無表態，亦非說謊。

鄧蓮如欲語還休

兩局內部會議內容，有着保密宣誓的限制，不得隨意洩漏，但這個理由，是否可以作為隱瞞事實和欺騙社會大眾的藉口呢？民選與委任議員的區別，最主要的便是在這個問題上；假如這些故意隱瞞事實、欺騙市民的事件，發生於西方民主社會，被揭發出來的後果將會怎麼樣？美國「水門事件」應是說謊者的殷鑑。

今年1月10日，一位依靠香港納稅人金錢「供奉」的英國外交部大員，在沒有向香港人匯報中英會談最新進展的同時，却在美國紐約出席大富豪的聚會上，詳細透露當時中英會談的情況，他還刻意地向美國富豪們詳細描繪他估計的香港將來出路！會後並向在場的人說：「這只是給你們知道的，不能給香港人知道。」為甚麼美國人也可以知道香港的未來命運，而英國政府還要隱瞞香港人呢？

一樁樁的歷史懸案，只能交回歷史去了結。

什麼是香港繁榮的因素呢？在形勢比人強的情況下，知悉會談進展的行政局議員，開始要思索上述問題了，他們必須明白香港繁榮的因素是什麼？英國代表團要求中國保證的又是什麼？配合形勢的發展，連串問題將是確保英國人能夠達致改選目標的必要因素。

1月6日，行政局議員鄧蓮如在一個午餐例會，發表她認為的「香港社會八大支柱」——

- 一、市民在法律下享有自由；
- 二、具有互相制衡力量的憲法；
- 三、奉行諮詢制度和重視輿論；
- 四、政府明白需要取得市民對政策的同意；
- 五、政策和政制保持穩定；
- 六、公平的法律條文；
- 七、市民對自己和本港社會建立及維持信心；
- 八、人力資源。

最令新聞界感到有趣的，不是鄧蓮如的精闢分析；而是她演講結束後回答問題時洩漏的天機。當時一位與會者問：「鄧小姐，你是否認為英國政府的存在，是唯一可以抵擋中國插手干預香港事務的方法呢？」一向口齒伶俐的女強人，此刻竟有欲語還休、欲言又止的表現，她語帶含混地說：「英國管治目前……（啊……）……一直都是一個緩衝，一如你所講……（啊……）……去令香港隔絕所謂從邊界另一面而來的改變。但（啊……）……我不認為這是必然唯一的方法。」

明知英國已經「扯起白旗」，在97年後準備完全退讓，聰明的鄧蓮如當然不會再堅持「英國統治」的重要性。

務求減少直接干預

蒙在鼓內最可憐的，應該是右派工會。他們在毫不知情下，還鼓其餘勇，拉大隊向兩局議員請願，要求議員們竭力保持香港現狀。

1月4日（即鄧蓮如發表「八大支柱」講話的前兩天），號稱代表八十二個工會、十五萬工人的港九工團聯合總會，還響應議員們的呼籲發表意見；他們委出代表前往兩局議員辦事處要求會見議員，反映他們「十五萬工人」對前途的意見。

由於沒有預約，這些代表「乘興而來，敗興而返」，無法會見他們心目中的青天大老爺；不過，

假如真的有議員跟他們會面時，彼此又能說些什麼呢?! 可能代表們的聲聲保持現狀，只能惹起議員的無限神傷。

還有一些立場經常變的人，也在這段尷尬時刻張頭探腦。例如1月10日，市政局主席張有興便以爲英國仍堅持爭取「英國聯繫」的立場，因此他在市政局周年辯論大會上說：「香港在適當時候，應實行港人治港，但在97年後……希望屆時香港能以類似『聯繫區』的地位，與英聯邦保持國際關係。……中英應達成協議，97年後延期三十年，始將港島和九龍半島主權歸還中國。」奈何在「輕舟已過萬重山」的環境下，一些有「舞蹈天才」的人，只好再度表現舞姿，轉換到另一個立場！

另一方面，兩局議員經過一段不知所措的失落日子後，部分理智人士，開始認識到當前急務，是如何將未來改變減至最低程度；日後部分議員在兩局內部會議提出的「設立路障、抵擋未來中國的干預」等等，便是在這段期間，逐步醞釀出來的。

覺悟保密不利港人

首先收拾心情，面對現實的，是立法局中比較年輕的非官守議員；他們在83年聖誕假期內多次聚會，共商對策，最後並將他們的意見寫成一份報告，呈交港督及行政局，要求英國政府考慮讓香港人可以直接參與談判。報告認爲，中英談判既已解決涉及國體原則的主權問題，並且開始觸及未來香港的具體安排，香港人有權利，也有必要直接參與。

議員明白「保密原則」是香港人直接參與會談的最大障礙。故此立法局議員李鵬飛1月3日便在崇基書院教育委員會的周年大會上，公開要求中英雙方重新檢討「保密原則」。

十日之後，立法局議員周梁淑怡亦在市政局周年大會上，作出類似呼籲。

連串言論，清楚顯示一些兩局議員，已經明白「保密原則」對香港人絕對不利。自此以後，每有英國大官到訪，這些已經覺悟的兩局議員，都力逼英國的大官們，追問他們為什麼不肯撤銷「保密原則」。

不過，中英政府固執到底，港人遂對前途安排無置喙餘地。

註 15. 「信報月刊」83期第4至5頁及「信報」1984年1月30日。

《十七》

英國徹底讓步 北京將信將疑

由於英國的退讓既急且速，北京對倫敦在第七回合會談的有條件投降，初時還抱着半信半疑的態度；83年12月初，新華社香港分社負責人在主持第七回合會談進展工作匯報會上，便作總結性地說：「英國人態度雖然有所改變，但慎防有詐。」

12月10日，文匯報一篇回顧中英談判半年發展情況的社論，忠實地執行了上述總結說話的精神。該篇社論藉着反駁英國一些言論提出「聯繫」和「共管」等建議，來點化英國政府¹⁶。

新華社社長許家屯亦在今年1月10日，在港大評議會發表「前途與希望」的講話，首次全面地在港闡述北京對香港問題的政策，從這種刻意安排看來，反映中國明白會談已經轉入細節性具體安排的討論，當時應該是對香港人公開宣傳中央政策的適當時間。

84年1月底舉行的第八回合會談，中英雙方認真地按着中方提出的「港人治港」方案進行具體商討，英國代表團表現出極友好合作態度，使中方代表團一名成員也私下表示：「英國人真的讓步了，會談進展順利。」

由今年1月3日舉行的第八至十一回合會談，具體確定了97年後中國對港的種種安排，在英國外相賀維訪華以前舉行的第十二回合會談，只不過是重溫過去四回合會談，有沒有遺漏一些甚麼問題，故此是一個循例的總結會議，中英雙方都沒有提

出甚麼新話題。

今年8月1日，賀維在香港記者招待會上透露中英協議的十項主要條款，其實早已在賀維今年4月首次訪華期間，便已確定下來。

英國政府一再聲稱「為香港人爭取一個詳盡而有約束力的協議」，詳盡而有約束力應是指97年後種種安排，但這一大堆協議中主要的內容，中英雙方只花了短短四回合時間便完全確定下來了，英國人為香港人爭取權益的誠意如何，於此可見一斑。

一名極瞭解會談進展的人士在十一回合會談結束後，亦曾私下表示：「英國政府既然放棄了97年後繼續管治香港的地位，97年後種種安排已經是中國內部事情了，與英國人沒有甚麼直接關係，這些東西，應該容易談得攏；97年以前種種安排，直接與英國人在港的管治地位發生衝突，談起來，恐怕還要困難一些！」

後來的發展，果然證實是如此。

- 註 16. 1983年12月10日文匯報社論說：「英方報刊的言論表明，英國是想要中國答應各種符合英國的要求後，英國才答應交回香港主權，這是根本行不通的。事情恰好相反，英國應該首先答應交回香港主權，解決了原則問題，一些具體問題才便於商量，這是談判能否取得進展最起碼的條件。現在英國將它本末倒置，這無異是談判的障礙。……為了妥善地解決香港問題，我們殷切地希望英國改弦易轍，在下一回合（第八回合）中將顛倒了的事，重新顛倒過來，首先承認中國主權，然後商量具體問題，這樣事情就好辦，也容易在明年9月前達成協議。」

《十八》

不是羅保的「羅保動議」

1984年2月24日中午，政府新聞處透過傳真機，發出下面一則不足一百字，但內容震撼香港的新聞——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羅保今日表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已知會政府，將於3月14日立法局會議席上提出下述動議：「任何有關香港前途之建議，在未達成最後協議之前，必須在本局辯論。」這就是後來引起廣泛爭論的「羅保動議」，但有誰知道這個以羅保命名的動議，其實並不屬於羅保的！

新聞處發放該則新聞後一小時，剛結束第九回合中英會談後返抵啟德機場的尤德，成為數十名記者的「獵物」；從尤德木訥和呆板的神情，記者當然找不出一些線索，但奇怪的是，這位不擅詞令的港督，意然回答記者的問題說：「我曾經聽過（羅保動議），我知道這項動議，他們曾經向我提及。」當記者追問他如何評價時，尤德笨拙地說：「應該由提出動議的人去評論才適合。」

敏感的記者即時嗅出火藥味來；可能尤德在「啞子吃黃蓮，有苦自家知」的情況下，正懊惱不堪呢！

這項遭中方發動宣傳機器口誅筆伐的立法局議案，有人指責是英國政府的「民意牌」，但實質是一場精彩的「港、英鬥智」的產物。

一向老練沉實的職業外交家尤德，竟被香港行政立法兩局不諳政治技巧的非官守議員的「設計所擒」，難怪他對羅保動議只能笨拙地回答說：「應

該由提出動議的人去評論才適合。」

1983年底，當尤德向兩局議員送出「聖誕賀禮」，表明英國在談判桌上舉手投降後，兩局議員便積極研究對策，開始醞釀「羅保動議」，因為他們當時面對的，是如何承擔他們自付為民請命的責任——如何確保英國政府履行曾經作出的承諾，即「將來中英協議，必須為香港人所接納」，從而確保香港的前途，不會成為英國政府談判桌上謀取自己利益的賭注。

本來最理想的解決辦法，是有香港人參與會談，直接監察英國政府在談判桌上是否為香港人爭取權益。不過，中方一再表明她是唯一代表港人利益的政府，且聲明不容許中英代表團以外的「第三隻腳」，因此直接參與談判只是夢想。

兩局議員有何對策呢？收集民意，交英國參攷，然後通過英方代表團向中方力爭嗎？從首七回合會談結果來看，有關努力完全白費。

議員意見不被重視，核心在於缺乏代表性，要解決這個問題，最徹底是以直接選舉代替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的委任制度，但遠水不能救近火！

尤德「啞子吃黃蓮」，羅保「被抬上轎」。



那怎麼辦呢？唯一可行的選擇是鼓勵香港人多就前途問題發表意見，希望藉全港市民，最低限度大多數人的集體力量，逼使談判桌上的中英代表，不能輕視港人意願。

議員妙計智取尤德

在保密原則束縛下，市民如何可以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多發表對前途意見呢？先決條件自然是議員率先表態，逼使英國政府透露更多會談內容，以便市民可以作出反應。

於此可見，問題核心是如何在重重限制下，向「保密原則」挑戰？基於信誓守秘原則，行政局議員一直不能向外透露會談內容，故此他們是有口難言；至於立法局議員，除了少數敢言者外，大多數都三緘其口，但個別議員發言，根本起不了帶頭作用；他們也不知道中英會談的細節，故更難帶引討論。

考慮種種實際困難後，終於有議員提出以集體力量，試圖打破保密原則——議員可以在立法局提出動議公開辯論，由二十多位非官守議員輪流發言，藉着表達他們對香港前途的看法，指出問題的核心，從而發揮帶動香港人討論的作用。

要實現上述設想，兩局議員首先必須克服預計來自香港政府的阻力。開始時，部分議員還有一些猶豫，畢竟港督還是英女皇的代表，而他們任職議員時，曾宣誓效忠英女皇，那麼怎可以「籠裏雞作反」？

今年1月22日的一則新聞，令議員下定決心；當日「星期日時報」發表一篇有關香港前途的報導，題為「戴卓爾夫人將香港拱手交給中國」¹⁷。

五天後，兩局議員在一次內部會議中，嚴詞質詢出席的政府高官，追究「星期日時報」的報導是否真實。這些高官支吾以對，不肯正面作答；而英

國政府亦沒有否認有關報導，令議員感到英國政府不可信，也逼使他們立下決心，確保英國政府在會談桌上轉變立場後，中英二國將來達成的協議，仍會是香港人所能接受的；另一方面，自然也要防止英國再以香港人的利益來換取英國利益。

在衆志成城下，兩局議員終於在中區太古大廈，上演一幕智取港督的活劇。

今年 2 月，尤德又在主持兩局議員內部會議，話題自然也是集中在香港前途問題上。在巧妙安排下，一位立法局議員首先發難，詢問尤德可否在立法局會議上正式討論香港前途問題，讓議員們各抒己見；一如估計，尤德即時作出反應說：「現在時機尚未成熟。」不過，在反對缺乏理由支持下，尤德被逼作出一項反建議：「可否採用提問題的方式？」言下已有讓步之意，答允先由政府粗略述說會談目標及其大致進展。

早已成竹在胸的議員們，自然不會接受這個毫無吸引力的反建議；另一位議員隨即加入「戰圈」，指出香港前途問題關係重大，絕不應以提問題形式處理；他接着又作出反建議：「假若現時不適宜討論，是否也應先和總督閣下研究香港政府將會同意用甚麼字眼的動議。」在熱切要求的氣氛下，尤德自然不能斷然拒絕；於是另一批議員即時提出多個早已準備的「動議」，交由尤德研究。

幾經修改後，尤德終於選取一個他認為可以接受的議案，也是日後震撼香港的「羅保動議」。

尤德「Acceptable」（可以接受）語音剛盡，議員們即時齊聲表示：「We want to have this motion debated now！」（我們希望即時辯論這個動議）。這個時候，這位英國資深職業外交官的老練公務員，才發覺自己已經身陷羅網，無從脫身！既然自己認為「動議用詞可以接受」，爲了顧全權威及面子，尤德唯有被逼同意。

有了「動議」和「御准」以後，還欠一個幕前提出動議的主角。這個議案提出來後，必然招致中方的猛烈批評，應該由那位議員當「替死鬼」呢？2月24日召開的兩局例行會議，便是要解決這一個大問題。

資歷夠深羅保被抬上轎

會議開始時，在「推莊」念頭下，有議員提議應該由提出「動議」的議員出任主角。「推莊」態度即時引起反應，一位議員理直氣壯地說：「應該按照立法局傳統，由最資深的議員代表立法局全體非官守議員。」行政立法兩局，最資深者首推鍾士元，但他已不是立法局議員，不能由他在立法局提出動議；接着按資歷往下數，最資深的便是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羅保，這位平日甚少見報的羅保先生，便是在推無可推的情況下，被抬上「花轎」。

當天會議後，兩局議員隨即傳召政府新聞處處長曹廣榮，要求他親自處理向外發布這個極具震撼力的消息，務求搶在英國外交部次官雷斯訪港前見報。

僅七十七個字的新聞公報，迅即像投下廣島的原子彈一樣，震動了整個香港，左派人士的反應更是「陣腳大亂」。

消息公布當天，適值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舉行春茗，宴請的又是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及本港工商界知名人士。當「許第一」步離宴會場，新聞記者立即湧前，實行攔途截訪，要求許家屯評論「羅保動議」。這位中央大員應對果然得體，他的簡單答覆是：「我相信英國當局會正確處理這個問題。」

可惜翌日許家屯因中央大員突然抵穗而立即北上。「將軍一去，大樹飄搖」，左派在當時的新華社副社長羅克明指導下，立即亂扣「帽子」，使人更對許家屯輕描淡寫的評論讚嘆。



羅保



許家屯

「羅保動議」提出後的第二天，文匯報和大公報的社評和專論，開始口誅筆伐¹⁸。

文匯報和大公報真正敗筆，不在於發表來論和社評，而是他們竟然訪問地理系講師薛鳳旋，並由他批評羅保動議嚴重違憲。試問一位研究地理的講師，又怎有足夠權威性和法律修養，來評論如此專門的憲法問題？結果當天晚上，香港政府發言人立即發表聲明，反駁「羅保動議違憲」的說法。

港英鬥智變為中港鬥爭

這一事例除反映有關人士無知外，還顯露左派「唯命是從」的缺點。假如「羅保動議」真是港府精心炮製的傑作，它有可能違憲嗎？立法局議員本身的權力來源以及慣用的「遊戲規則」，就是來自香港憲法，若旁人也可一眼看出的所謂「嚴重違憲」，他們還會如此愚蠢推出嗎？

被轟的兩局議員也有強烈反應。一位躋身其間的人士憤慨地說：「提出的議案，絕非港府或英國策動，而僅是出於議員們的歷史責任感；動議目的只想反映羣衆對97問題的意見，藉此向英國政府質詢

——如何能夠達致英國首相許下的承諾，完全承擔對香港人的道義責任——倘若立法局議員不在這重要歷史問題上主動提出辯論，對不起香港人，也不配當議員。」

証諸 3 月 14 日立法局正式辯論「羅保動議」的二十二位議員發言——完全沒有要求港人應直接參與會談，僅是集中要求「中英兩國政府應該將談判內容公開」——可見左派對該動議的恐懼是無根的。

正如許家屯的精簡評論一樣，原是「港英鬥法」的好戲，竟因許家屯突然離港，而被其他無知的左派中人演化為「中港鬥爭」，倫敦政府的尷尬難題亦一筆勾銷，真是活該。

- 註 17. 該篇文章披露「1979年鄧小平邀請前港督麥理浩前往北京訪問一周，主題自然是香港問題。鄧小平告訴麥理浩中國希望收回香港——整個收回，但害怕這將會影響香港商界信心。麥理浩沒有告訴任何人，除了他的僱主——White Hall（英國政府辦公的地方）。」
18. 文匯報社評說：「姬鵬飛主任日前又明確表示，在恢復行使主權之後，如何把香港管理好，歡迎香港各界多提意見。……對於這種藉動議來搞新『三腳棍』的做法，是不能同意的……總之，羅保的動議是極不明智的，其結果只能是製造新的不安。」
- 大公報一篇署名黃鋒的來稿，質問「羅保動議」目的何在？文章說：「在中英談判逐步獲得進展，人心思定，信心漸復之際，這個橫生枝節的動議，是不合時宜和不得人心的。」

《十九》

兩局倫敦行 ——看清英國人咀臉

「政壇上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恒的朋友！」今年5月赴英的兩局議員代表團，應對此有深刻體驗。當六十六歲的鍾士元，站在英國國會門前沉痛地說：「香港今日已處於一個危險時期，如果港人再不出聲，就再無機會出聲了。」這種近乎絕望的呼喚，正是他對殘酷政治現實的控訴。

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是港督親自委任的，按照英皇制誥，他們是港督推行政策時的最高諮詢者；從直覺推斷，兩局議員肯定是港督及英國政府可以信賴的人，而且在他們就職前，先要宣誓效忠英皇，所以在香港前途問題上，中方不時批評他們是毫不出奇的。但英國政府為甚麼也會「棒打」兩局議員呢？這看似不可能的事實，偏偏在現實政治舞台上上演，歸根究底，還不是利益作祟？！

議員團赴英，主要是賀維今年4月20日在香港首次披露英國將「下旗離港」的消息，他並說「中英協議最終要交回英國國會批准」。這提醒了兩局議員，只有英國國會才可以放棄英國殖民地，並促成他們組團赴英。

港府高層也有支持議員團赴英的聲音。一位政府高官表示：「儘管英國大官每次來港，議員都盡量爭取機會，反映他們所瞭解的香港民意，但英國的大官，即使在港時，對港人憂慮及意見有深刻體會，但當他們返到倫敦，會否將之拋諸腦後呢？人性畢竟自私，總會希望盡量減少煩惱；英國大官也

是人，他們會牢牢記着千里之外的港人呼喊嗎？」議員團訪英，就是希望透過主動接觸，向英國國會議員動之以情，說服他們堅持只可通過一份「必須為港人接納的協議」。

今年4月下旬，賀維離京返英後不久，國會便傳出公開辯論香港問題的消息，為了進行游說工作，兩局議員立即組織訪英團。

誓師出發擊中英人要害

5月9日，鍾士元帶領他「欽點」的八位兩局議員，在二十多位「同僚」送行的嚴肅氣氛下，啟程前往倫敦。就在他們踏上飛機前的最後一刻，兩局議員發表一份經長時間反覆磋商的立場書¹⁹，首次公開全體議員對香港前途的一致意見，提出他們的「六大疑慮和四項建議」。

立場書的最大敗筆，是以笨拙手法挑起國籍問題。無可否認，從道義角度，任何國家都不可能斷然取消自己國家屬土公民的國籍；而英國國會81年通過的國籍法，也只是將香港英籍人士「降格」，但依據國際公認的「人權宣言」，將來香港英籍人上

兩局議員誓師出發。



一旦被迫「投奔怒海」，英國人還是有責任照顧這些「子民」的；因此，長期以來英國政府最怕面對的，便是照顧香港英籍人士的移民責任問題。

一些議員透露，當時兩局內部有一種想法，希望故意挑起英國政府的瘡疤，藉此喚醒及逼使英國政府努力爭取一分「可令港人接受的前途協議」。

但立場書運用的「煽情」字眼，例如「本港現時有五百三十萬居民，其中約有半數來自中國，他們是爲了尋求較美好的生活而來，當然不願意再生活在中國共黨統治之下。其他的人呢？……國會可以放棄對香港行使主權，但它不能因此而褫奪英籍人士的國民地位。那麼，在香港的英國屬土公民的命運如何？……他們和其他不願在共產政權下生活的香港人是否有權移民英國？英國政府應否與其他國家商討，爲他們作移民的安排呢？」這不單損及香港人的民族尊嚴，也激起左派的抨擊²⁰。

另一方面，當議員團5月10日踏足倫敦後，立即被大羣英國記者詢問「香港人是否都希望移民英國，你們認爲英國可以收容二百多萬香港人嗎？」至此，兩局議員才明白用錯策略。

議員抵英當日，英國的主要報章已刊出他們到訪的消息。並有如下的報導：「兩局議員啟程前在香港發表的立場書，要求『保證維護英籍人士的權益』，可能導致戴卓爾夫人政府倒台，因爲英國現時嚴重的失業情況，根本不容許英國考慮收容香港二百五十萬名持有英籍護照的華人。」

兩局議員還沒有抵達倫敦，英國記者從何得知立場書內容呢？還不是英國政府導演的一幕「好戲」？

原來在議員啟程前，曾將一份立場書交給尤德，而英國外交部不久便從香港政府手中，取得該份文件，經外交部的「師爺」研究後，發現立場書強調國籍問題的漏洞。英國官員隨即召集英國記者舉

行「吹風會」，明確表示「不論將來中英協議結果如何，香港人移民英國的數量，將會受到嚴重限制。」英國報章就是在英國官員刻意渲染下，寫出上述有偏差的報導。

事後，有關人士分析說：「這些報導一方面誤導英國朝野上下，以為兩局團是想『拉衫尾』，爭取移居權，從而扭曲議員的形象；另一方面，突出議員團希望爭取移民權後，可以將香港與英國之間的利益衝突尖銳化，一些本來想為香港人卻又處於身不由己苦況的國會議員，自然會引起戒心，採取保留態度，因為他們若同情香港人，接納立場書的建議，一旦中英談判失敗，中國提早收回香港，英國政府將被逼收容大批香港移民；屆時同情香港人的國會議員，自然要負起『為英國引進移民，搶走本土人士飯碗，開罪自己選民』的罪名。」

飽受奚落鍾士元要辭職

5月10日下午，議員團在英國國會會見五十多名國會議員時，充分感到上述壓力。一位在大公司任職總裁的下議院議員率直表示，英國不可能容納更多的「難民」，目前越南難民在倫敦已經引起很多問題，因此「英國只能收容五千名香港人……，可能這個數目，比對五百多萬香港人是太少了吧！呀……我們即使盡最大努力，也只能收容二萬五千人。」

議員團一位成員迅即針鋒相對地說，香港人都不願意離開香港，香港人只希望有隨時離開的「太平門」，而這是英國政府照顧香港英籍人士的責任！

當然會見過程，還有很多針鋒相對的對話，但最令議員團失望的，是曾經向香港人承諾，為爭取港人利益在上議院發言的前港督麥理浩。他說：「你們不要懼怕，香港一定可以保持繁榮安定，我看香港出現問題的機會，最多也不過是若干分之一吧

！」一名議員立即冷言回答：「麥理浩先生，俄羅斯輪盤手槍上的子彈，也不過是一枚，中彈機會只是若干分之一，你會冒這個險嗎？」

在港時高高在上的議員們，在倫敦連番碰壁後，心情極之煩燥，鍾士元返抵酒店後，更衝動地站了起來說：「我要辭職！」隨即轉身返回房間，「嘖」的一聲關上房門。在同僚力勸下，這幕「罷官記」雖告流產，但充分反映出代表團在倫敦遇上的種種挫折。

5月12日，「南華早報」引述倫敦的消息說：「前港督麥理浩曾在其他英國國會議員面前，批評兩局議員今次倫敦之行。……麥理浩說，兩局議員日前發表的香港前途聲明是未經仔細考慮和不合時宜的……兩局議員應該放棄強迫英國准許英籍護照的英國屬土公民移民英國的建議。」這位應該十分瞭解港人心態及兩局議員辦事方式的「高個子」，如此公開指責兩局議員，又怎不傷透這班多由他委任的議員的心呢？

兩局議員盛怒之下，千方百計追查出麥理浩確實在5月10日作過上述評論，且有新發現。原來洩漏上述消息的英國國會議員，竟是當日在國會猛烈批評兩局議員倫敦行的「英國戰士」；他洩漏麥理浩談話內容用意何在？莫非有人想用麥理浩這位一度被視為香港最偉大總督的說話，來貶斥兩局議員的地位嗎？

議員聯手反擊麥理浩

九位議員仔細思量後，愈覺事有可疑；上述行動，極可能是那些企圖貶斥議員團地位的國會議員，認為麥理浩在香港地位崇高，由他來批評議員團，將可減低港人對兩局議員行動的支持。為了慎防有此一着，議員隨即致電香港，希望得到支援，一位資深行政局議員遂向香港新聞界「吹吹風」。

5月14日，太古大廈的兩局議員辦事處內出席吹風會的，有大約十名主要報章的資深記者，會後，他們一致認為吹風會「有料到」；因為香港記者首次聽到兩局議員親口批判他們的前度「波士」麥理浩。

主持「吹風會」的議員透露，麥理浩雖然任內表現優異，但每當香港與英國利益發生衝突時，他往往背棄香港，純粹以英國利益行事。這位議員還舉出生動的事例說：「令我印象難忘的，是英國在1979年提出國籍法草案；當時麥理浩蓄意掩飾法案對香港人的影響，及後兩局非官守議員發覺真相，他又多次阻撓非官守議員的挽救行動，並且一再反對兩局議員前往倫敦進行游說工作；最後，在上議院就通過國籍法作最後辯論及投票的前一天，他還反對兩局議員向上議院議員拍發電報表明港人意願。結果，上議院僅以二票之差（另一說是三票），通過了國籍法。」

港人在「被出賣」後的第五個年頭，碰上「港英鬥法」，才可以知悉當年如何被出賣。在這個過程中，兩局議員可以逃避責任，置身事外嗎？五年前兩局的三十多位議員，他們是否也同樣愧對港人呢？

兩局議員剛反擊麥理浩後，迅即在當日遭遇另一次來自中國的打擊。中國人大副秘書長曾滿，在北京點名批評兩局議員的立場書說：「（立場書）不代表香港廣大同胞的意願，不利於香港的穩定繁榮，它在企圖干擾中英會談的進行。」這位與香港事務無大關連的中國高幹，當天將上述三句說話反覆向在京採訪的香港記者說了兩篇，北京對立場書的不滿情緒，於此可見一斑。

當日，新華社社長許家屯亦親自召見三位兩局議員，警告他們要立即通知鍾士元「收手」，否則香港左派將會發動羣衆，實行反擊。

中國強硬態度傳抵英國以後，九位議員又再面臨抉擇——是戰？是降？是堅持下去？還是臨陣退縮？在沉重氣氛下，彼此默然相對了好一會，一位成員終於沉不住氣，憤然地說：「我們就賭上一舖，堅持到底！」接着，英國國會門前，上演了「鍾爵士求援記」。

許家屯警告議員們罷手

九位議員在「槍林彈雨」下「殊死」掙扎，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英國輿論界逐漸改變對議員團的觀感，一些報章還以同情態度報導他們在倫敦的活動；可惜這些遲來的憐憫，始終沒有改變國會議員對議員團的成見。

議員團期待已久的香港前途國會辯論終於5月17日舉行。當前赴國會旁聽之前，議員團還在酒店開會商討對策，爲了爭取時間，九名成員全部來不及在餐廳用膳；結果會議桌上，議員們只得一邊咬着麵包，一邊討論有關事項，這種狼狽的會議場面，相信都是他們從未經歷過的。

更糟糕的，是當九人趕到國會，準備聆聽辯論過程時，才發覺國會有不准當場作筆記的旁聽規例；九人只好採用默記方式，輪流記下每一位國會議員的發言內容；每當一位議員結束發言後，負責默記的，便要即時跑出會場，用記事簿記下發言內容，然後返回座位，準備迎接下一次的默記任務。

相對來說，令九位議員最難受的，恐怕還是喇叭傳出的國會議員發言內容。在五小時的辯論過程中，二十多位國會議員發言的，大多是對香港全無認識的淺薄意見及對「移民潮」的恐懼。

兩局議員一直認爲英國政府在道義上，有責任替香港人解決的移民問題，外相賀維在辯論開始前，已開宗明義地堅決表示：「我並不相信，今屆國會或其後繼者會同意作出改變，以鼓勵他們（指香

港人）從香港移居英國或其他地方。」

這段說話，清楚表明英國政府是不會打開香港人期望的移民「太平門」的；羅德丞提出的「打開太平門後，香港可以無後顧之憂，有事時可以移民到英國；信心問題一旦解決，香港人定必繼續努力在香港工作，根本無人會想移民到英國」的論調，英國政府根本不會考慮。

對於英國政府的現實態度，鍾士元亦唯有憤慨地說：「我瞭解到在移民問題上，英港的利益會有衝突，但英國政府不應因此而忘記對港人的義務和責任。」到了這個時刻，鍾士元應該明白，道義終歸還是道義，影響現實政治作出各種決定的最終力量，始終還是利益的問題。

儘管鍾士元返抵香港時，仍在機場強顏歡笑地說：「這次前往倫敦的目的，可算是達到了。」但一位非常瞭解情況的人士表示：「此行最大的收穫，其實是讓兩局議員清楚看到英國政府的真面目，令他們明白甚麼才是英國的談判目標。」

經過倫敦之行，兩局議員本來對英國的「愚忠」，或者不必要的幻想，至此一掃而空；他們開始明白，只有與中國直接對話，才能真正解決香港前途問題，結果促成他們後來的北京行。

註 19. 題為「香港的前途」，可參閱本刊87期第8頁。

20. 84年5月11日大公報一篇題為「蠱惑人心的聲明」的社論說：「聲明歪曲歷史事實，把香港居民分為兩類，以『不願再生活在中國共黨統治下』作為幌子，要求英國政府為他們作移民的安排。……如果有人對中國政府這樣合理的態度（指五十年制度不變）、坦白襟懷視若無物，甚至歪曲中傷……製造混亂，於人於己都沒有任何好處的。」

文匯報社論的語調更強硬：「綜觀『聲明』立場，只能說是少數殖民主義頑固分子所堅持的立場……而妄圖攪亂人心，阻撓中英談判達成協議而已！然而，歷史的巨輪是無法扭轉的，百多年的殖民恥辱是一定要結束的。」

《二十》

兩局議員訪北京風波迭起

今年6月21日，中英會談工作小組在北京舉行了首次會議，標誌着中英談判接近尾聲。

在這個新階段開始的同一日，三位行政局議員——鍾士元、利國偉和鄧蓮如——在北京機場出現；儘管中國一再否認他們是代表兩局議員赴京「朝聖」，但作為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的鍾士元，卻認為他代表了兩局，甚至反映香港人的一般民意。

鍾利鄧三人赴京前，不單經歷頗長的醞釀期，而且對個別成員來說，還經過一番艱苦的思想鬥爭。

83年底，港督正式向兩局議員透露放棄「爭取延續英國管治香港」的談判目標以前，議員赴京只會是赴英京——倫敦，前往北京「朝聖」，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因為在兩局內部會議，有人提出類似建議時，必受到較保守的議員批評提議者「媚共」或「想做中國貿易」等「莫須有」罪名。

時移世易要與北京接觸

這種既不敢、復不願與左派正式接觸的心態，當然有着它的歷史背景。第一議員均宣誓效忠英皇，在他們眼中，中英談判中每一個問題都經過討價還價，才會作出讓步；經英皇委任的兩局議員，當然將自己視作談判桌上英方一分子。基於這個原因，他們自然不會主動示弱到敵陣討價還價。

第二，中英談判初期，兩局議員與英國政府的目標是一致的，他們共同認為繼續延長英國在港管

治地位，是解決問題的最佳選擇；彼此目標既然一樣，議員們根本毋須親自前往北京反映意見；即使要讓中國領導人瞭解香港人的不同意見，個別議員自己可以私下成行，毋須由兩局派出代表團負起這項工作。

第三，部分議員當然也會瞭解到北京「朝聖」，可以發揮刺探敵情，瞭解中國立場的作用。早年的「溜」派上京目的應是如此；但隨着來自不同行業的「朝聖團」相繼訪京，他們帶回來的訊息，差不多都相同；在議員眼中，這些說話毫無新意，而且可能客觀上造成為「對手」不停提供宣傳的機會；另一個理由是恐怕成為中國的統戰工具。

但去年底港督宣布英方「投降」後，形勢開始轉變；議員從英國不斷退讓的行動中，逐漸看出英方在談判桌上主要考慮的，可能只是本身利益，假如議員放棄說話機會，拒絕赴京，談判的最終結果，將是英國人完全按照中方的提議，在中國方案下逐點「討價還價」，且可為英國爭取更大的政經利益吧！

今年初，兩局中人大多已認識到有需要前往北

議員皆為護利鄧三人後盾。



京，但也有部分資深議員，一方面礙於面子問題，恐怕北上將有投降之嫌；另一方面，兩局議員中極大部分在意識形態上，始終還是不喜歡共產黨的，這種心態令中港直接「對話」無法實現。

當然，站在中國立場來說，在英國政府正式宣布放棄香港主權以前，中國根本不可能與兩局議員展開正式「對話」；因為這種做法難免被人理解為變相的「三腳櫬」，犯了中國的大忌。

儘管有上述多種無形障礙，但左派與兩局個別成員一直都有非正式接觸，而且從未間斷。左派接觸的，早期香港大學校長黃麗松，後有三位年青立法局議員如李鵬飛、張鑑泉和周梁淑怡，還有重返行政局的利國偉。羅保動議確曾令左派對兩局議員大為不滿，兩者的交往雖未中斷，但其重要性已告減弱，因為不論議員說甚麼話，左派都會審慎地再三推諉，恐訪「話中有詐」。

除上述幾位議員有與左派接觸外，兩位比較資深的立法局議員田元灝和胡法光，也因生意關係，與左派人士時有接觸；不過他們大部分是立法局成員，對中英會談瞭解不多，難以負起「架橋」作用，在客觀環境限制下，溝通的責任自然落在行政局，特別是「大 Sir」鍾士元的身上。

一再拖延人選難定

今年 4 月 20 日，外相賀維在香港宣布英國將下旗離港的立場後，中國提出的「港人治港」方案，已成香港將來唯一出路，兩局也只好依循這個大原則，與中國洽商或者爭取較理想的「港人治港」；至此，議員在內部會議談論「港人治港」，已不再被視為「媚共」；長期存在於中國與兩局之間的鴻溝障礙，已逐漸消失。到了議員團 5 月下旬結束倫敦行後，他們有了名正言順的北訪藉口：「要完成反映民意的工作，除了到倫敦，還應該到北京向

中國領導人反映意見。」

賀維 4 月 20 日發表聲明後不久，新華社便向行政局招手，並於議員團 5 月 9 日赴英前，與利國偉及鍾士元接觸，許家屯盡量安排他們會見鄧小平。

北京行一事因鍾士元要率隊赴英而一拖再拖，怎料夜長夢多，鍾士元由倫敦返港後，因赴京人選而與新華社產生磨擦。

原來鍾士元和利國偉最初打算秘密上京，但鍾士元在倫敦處處碰壁後，與九位同僚嚐透共患難的味道，鍾士元遂私下向代表團成員透露準備前往北京的計劃，到了代表團返港以後，鍾士元再次與許家屯接觸時，便提出增加成員的要求。

雙方經過協商後，初步擬出一份五人名單——鍾士元、利國偉、鄧蓮如、李鵬飛和張鑑泉；後兩者是新華社一位要員提議的，不過，兩局其後開會商量後，認為與鄧小平會面，談話時可能觸及中英會談內容，因此成員應該全部由行政局議員組成；另外，兩局成員希望這個「北京團」可以代表兩局，而不單是行政局，因此建議將立法局的「一哥」羅保加進去。

怎料當這個名單遞交新華社後，立即被斷然拒絕邀請羅保，因為他曾提出左派認為不合時宜的「羅保動議」；兩局遲遲不能向外公布「北京團」成員名單，正是因為在人選方面與香港新華社爭持不下。

除人選外，另一個衝突點是訪問團的名稱問題。鍾士元一直堅持要以兩局非官守議員身份赴京，許家屯則強調中國絕不接納「三腳橈」，三人只可以用私人名義赴京，議員身份則大家「心照不宣」。

當許家屯在「大公報」主辦的中國攝影畫展上，宣布三人啓程消息前，許鍾二人仍就名義問題爭得臉紅耳熱，最終還是你說你的，我說我的。

新華社與鍾士元多番衝突後有點光火了，爲了

抑壓三人的地位，避免別人誤解鄧小平只見他們，許家屯迅即安排由唐翔千、倪少傑、唐驥千三人組織的香港工商團先行上京，搶在鍾士元之前，並先由鄧小平予以接見。

借商會代表貶抑三位議員

在這種錯綜複雜的形勢下，我們看看新華社報導鄧小平會見工商團和鍾士元等人的消息有何差別。

「鄧小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會堂對香港工商訪問團說，香港人要有志氣，有信心把香港管理好。……鄧小平在會見訪京團表示相信，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一定能把香港管理好。……唐驥千和倪少傑也講了話。他們對1997年後香港的社會制度在五十年內不變表示歡迎。近兩個小時的會見，是在充分信任和坦率的氣氛下進行的。」

對於鄧小平會見三位行政局議員的過程呢，新華社報導如下：「鄧小平強調指出，中國政府為解決香港問題所採取的立場、方針、政策是堅定不移的，是符合五百萬香港人的利益的。……鄧小平說，你們來了解一下北京，了解一下中華人民共和國，了解一下中華民族是有好處的。……兩年來，我們同香港人士進行了廣泛的交談，香港真正的民意我們是知道，我們提出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做法是充分考慮了香港的實際情況的。鄧小平說，我相信，香港人有能力管好香港，中國人不是低能的。」

從這兩則報導，我們不是很清楚看到中國對這兩個訪問團之評價嗎？

兩局議員自京返港後，更因在記者招待會上說「鄧主任不相信我們所說的是港人真正的意見，能真正反映現在香港人的心理和信心狀況。他相信香港並沒有信心問題，他說中國對香港的政策，是完全照顧客觀和實際環境。」這番話立即掀起另一次

大罵戰。

許家屯更於6月28日在青年經理會發表「我們的時代」的講話時說：「我們也不能把一些殖民主義者的孤臣孽子，當作是香港同胞的代表形象；把一部分人暫時的疑慮，當作是社會信心崩潰的表徵；把少數人的哀怨之音，當作是香港全體同胞的心聲。」

許家屯的詞鋒直指鍾士元等人，其後幸得中間人調解，雙方終於達成協議——各退一步；新華社發表鄧與工商團的會見過程，鍾士元則發表三人與鄧的對話全文，讓關心這次風波的人可閱畢全文，再加以比較，才自行下判語，一場風波就此平息。

在此順帶一提的是，6月下旬有關方面漏出有議員向北京寫自白書的消息，而新華社一份分析三位上京議員的文件，指出「他們立場不一樣」，不過寫自白書的人並非上京者。

《二十一》

中英怎樣互讓互諒？

今年9月21日，英國內閣正式通過協議草案，中英雙方亦於9月26日正式草簽了。賀維對會談作了如下的總結：「英國覺得已經盡了責任為五百三十萬香港人，辦到最多可以做的事情……將來的中英協議，是中英兩國政府可以做到最隆重的地步。」

究竟英國政府為香港人盡了些甚麼努力？賀維兩度訪京，又為香港爭取了甚麼呢？中國外長吳學謙9月19日在紐約向記者所作的一番談話，為香港人提供了重大的線索。

當吳學謙被問及「有關香港前途的談判，現在基本上已經圓滿解決了。請問閣下對英國外相賀維的印象如何？」

賀維四月訪華作出三項承諾

他回答說：「賀維先生以前我不熟……這兩次談判〔指賀維84年兩訪北京・編者〕見面時間長……每次有兩三天在一起工作，我對他的印象是不錯的。他是一個很願意聽取別人意見，同時在有不同意見時能平心靜氣的互相來討論問題……儘管談判中，他當然代表英國政府的利益，我是代表中國政府的利益，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大家都想為了中英兩國經濟技術合作能夠有更廣闊的發展。」

原來香港前途談判的最終方向，是為了中英兩國經濟技術合作能夠有更廣闊的發展！吳學謙終於

一語中的，道出了整個談判的最終目的，但香港的利益又怎麼樣？

今年4月15日賀維首次踏足北京機場後，在不到四天的緊密訪問行程中，先後會晤了中國外交部長吳學謙、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總理趙紫陽及鄧小平主任。

4月16日，賀維與吳學謙進行了整天會議。會後，新聞司齊懷遠在介紹會談情況時，只簡單地說：「中英兩國外長全面深入地就香港問題進行了三個多小時的討論。雙方闡述了各自的立場，估價了已經取得的進展，並且研究了為達成協議還需要做的工作。」在這個簡單的描述後面，中英外長進行了大量的認證工夫。

在第七回合會談，英方代表團團長柯利達曾向中方轉述戴卓爾夫人的口訊，表示英國願意在有條件的情況下放棄97年後香港的管治權；所謂「有條件」，就是中國如何在97年後，作出妥善安排，確保香港生活不變，制度不變；這就是中英八至十一回合會談討論的主題。賀維與吳學謙進行的引證工夫，便是仔細覆核過去幾回合會談所得的結論，從

鄧小平繩綑而談，賀維誠惶誠恐。



而判斷英國是否已經取得充分條件，可以放棄香港的主權和治權。

賀維與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會晤，純是一種友誼式的拜訪，雙方也是各自表達自己對香港問題的看法。

當天下午，賀維與趙紫陽會面時，明確表示英國願意以協議方式放棄香港的主權和治權。齊懷遠在形容會見情況時，便曾披露一些兩人的談話內容，例如趙紫陽說「香港問題的解決，將使中英兩國關係進入新階段」，賀維則表示「盡早就香港問題達成雙方滿意的協議的願望。」

齊懷遠當日還同時宣布鄧小平將於翌日（4月18日）會見賀維。

多個消息來源的透露，賀維在會見鄧小平的時候，最低限度作出三種承諾——A、同意中英在今年9月以前先行草簽協議，12月再行正式簽署；賀維保證英國國會不會反對協議內容，國會並將在正式簽署以前，有一個月的辯論時間；B、1997年，英國將交回一個繁榮和穩定的香港給中國；C、同意鄧小平提出成立中英聯合小組，解決過渡期問題。

英國朝野一心 賀維智珠在握

鄧小平一直堅持中英談判要在今年9月以前完成，賀維與鄧會面時，首先表明英國有談判誠意，但礙於英國國會7月休會，沒有足夠時間辯論協議，因此英國政府無法在9月前批准協議。

賀維又向鄧小平表示，明白中國希望盡快公布協議，穩定香港人信心的立場，因此建議9月先行草簽，並公布談判協議，英國政府將協議提交國會辯論後，再進行正式簽署；賀維並保證英國國會是不會反對草簽協議的任何內容。

賀維信心十足，原來是他訪京之前，已經跟英國各大政黨負責人，就香港問題取得諒解；因此他

有胆向鄧小平保證國會內不會有阻力。這種合作態度，當然令急於解決香港問題的鄧小平十分滿意。因此鄧小平代表中國表示諒解英國的困難，同意先行草簽協議，但堅持正式簽署須在今年內完成。賀維7月再度訪華時，鄧小平形容中英協議是在「互諒互讓」下完成的，上述就是這種「互諒互讓」的具體表現！

鄧小平接着也談香港的十三年過渡期問題。他向賀維表示，97年以前香港還是歸英國管治，中國不會干預；十三年後香港歸還中國，實行港人治港，英國人也不要干預。

幽默的鄧小平還向尤德說：「你要負起十三年的工作囉！」

他續說：「像的士事件，中國不會去管，但多搞幾次，對香港不利，破壞勢力會乘虛而入。」賀維針對鄧小平這樣的憂慮，一再保證未來十三年，英國政府將負起管治香港責任，97年交還中國的，將是一個繁榮和穩定的香港。

鄧小平6月下旬會見鍾士元時，曾提出在香港設立聯合小組監察過渡期的各項工作，當時香港曾引起一陣騷動，認為設立聯合小組將使港府成為「跛腳鴨」政府；但這些反對聲明根本起不了作用，因為賀維4月訪華時，已經清楚地向鄧小平表示，同意有需要在港設立聯合小組，負責協商、諮詢工作。

應允成立兩局反對的聯合小組

鄧小平當時說，成立聯合小組是為穩定十三年的過渡期，解決香港問題，中國收回主權，對香港來說，是天翻地覆的變動，任何人，包括英國政府也無法保證出現什麼問題都能解決，有聯合小組就可以互相商量，共同解決。

其實聯合小組的構想，早在第十二回合會談時

，中方提出一系列97年後在港各項安排後，便提出設立聯絡小組的構想；當時英方對此曾加反對，認為這樣將危害港府在未來十三年的管治工作，但賀維會見鄧小平時，當鄧小平概括地表示，**聯合小組只負責協商、諮詢工作時**，賀維也急急表示同意成立小組了。

《二十二》

炮制大團圓結局

8月16日晚上，新華社香港分社聯繫各大新聞機構的電訊機，發出一段尤德和許家屯共晉晚宴的新聞稿，新華社形容雙方是在友好的氣氛下進行交談。

那邊廂港府宣傳機構——政府新聞處，亦發出類似的新聞稿，但這兩篇稿，均沒有透露談話內容，新聞界即時的反應是：「又不知他們二人決定一些港人無權知道的大事？」

幾經追查之後，發覺許尤二人原來正為中英談判謝幕前，安排一幕「大團圓」的結局。當晚席間，許家屯代表中央，邀請港府組織一個包括有高官及兩局議員的「香港政界知名人士」參觀團，到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三十五周年國慶慶典。

許家屯尤德任正副旗手

國慶是國家的大日子，中英協議要趕在10月1日之前簽署的一大理由，也是希望能夠讓中國國家領導人，在天安門城樓上閱兵的同時，向全國及全世界炫耀中國的統一大業，在共產黨領導下跨進一大步。

如斯歷史性場面，又怎能缺少一個陣容龐大和有代表性的國慶團呢？

要有代表性，自然不能缺少兩局議員，但假若直接邀請他們，可能會造成間接承認兩局地位的事實。於是在左派高層一方面向個別議員「拉衫尾」

，私下間詢問他們是否願意北上慶祝國慶；另一方面來一招「擒賊先擒王」，直接從尤德入手，請他代為組織一個國慶團。

尤德當時即場欣然接下這項邀請。但煩惱隨之而來，因為新華社除希望政界團包括布政司夏鼎基爵士、政務司鍾逸傑和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鍾士元爵士外，還希望有十八位議員和九位官員參加。究竟誰願意在這個時候上京呢？

邀請信終於9月4日送到尤德手中，議員也被迫要作出決定，但他們難免要先來一次痛苦的思想鬥爭。

在前途談判過程中，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作為一個整體，和左派的關係不單稱不上和洽，甚至可說是關係惡劣。今年3月羅保動議早已觸怒中國高層；5月兩局議員的倫敦行，更險些導致雙方「大火拚」；6月23日兩局三議員上京，更遭鄧小平當眾奚落；甚至許家屯亦批評其為「孤臣孽子」，這樣驚心動魄的記憶，議員們又怎可以在短時



間忘掉？

更令部分議員苦惱的是，一旦參加了國慶團，怎樣可以擺脫「隨風擺柳」的形象？而且被人公開羞辱後，斷不可能立即向人投懷送抱；加上成行之時，剛巧是中英聯合聲明公布後的初期，一旦答允北上，即使心中對協議有不滿，也難於啓齒，否則便會陷自己於尷尬位置。

爲免作繭自縛，自然不參加國慶團爲妙，這樣最少可爲自己保留多點彈性，結果國慶團名單遲遲不能公布。

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雖然起初有小部分從商的議員，私下亦希望北上，但礙於兩局之內佔主流的觀感，認爲不應提早表態，這批躍躍欲試的議員們，也不敢表現得過分熱衷。

因此，起初決定只派出兩位最資深的兩局議員北上。他們分別是鍾士元和羅保。議員所用的藉口，是「人數多寡並不重要，最重要是有代表性」。

孤臣孽子「被逼北上」

新華社接獲這份名單後，十分不高興，因與原訂目標相差太遠。於是左派施加壓力。9月11日在文匯報及大公報同時刊登了一則新聞稿，以「本報記者自有關方面獲得消息」的方法，道出了中國的願望。

報導說：「新華社香港分社邀請香港政界知名人士赴京觀禮的訪問團，總共二十七人，其中包括布政司夏鼎基爵士和政務司鍾逸傑等九名高級官員和十八名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該段報導並且透露，港督尤德爵士已經欣然接受了這項邀請，公開來一招「大石壓死蟹」，希望湊足人數。

兩局議員於是被迫再度召開內部會議，商討對策。席間，依然有人反對更多的議員北上，但在形勢比人強的情況下，自然開始有更多議員意識到同



中英兩國1984年9月26日草簽聯合聲明的歷史時刻！

左派保持一定良好關係的重要性，因此不應「拒人於千里之外。」

最後在沒有更佳的办法下，兩局議員同意將北上名單，完全交由港督自己決定，反正也是他「親口答允」許家屯代表組織的！

因處理中英會談工作而疲倦萬分的尤德，實行亂點鴛鴦譜；他翻開兩局議員的名單，逐一點名，終於籌足十人再加上六位高級官員，北上團才開始成型。經過新華社的同意及「諒解」之後，北上團的名單便向外公布。

細閱名單，便會發覺今次北上「賀慶」的政界團，主要包括港府高層內處理香港前途問題上有鷹派之稱的主要人物，例如夏鼎基以及鍾士元和李鵬飛等。他們願意北上，明確顯示形勢真的比人強。

港人再不能不承認「北方的老大哥」才是自己命運的主宰。自從67年暴動發生之後，左派或「左仔」的稱呼，在一般人眼中，特別是在富貴人家心中，一直不是好名詞。但到了今天，香港形勢已經轉變了。和左派，特別是新華社拉上關係，已經是

一種時尚，而且往往更是上流社會顯示自己在社會地位重要的門徑之一。

親英已落伍 左轉爭及時

六十年代的香港，爭取英皇獎章，俗稱的「荷蘭水蓋」），以及議員席位是上流社會趨之若鶩的時尚；但不久將來，大家可以預見政協和人大的代表地位，將會更為香港人所渴求，原先「拒共」或者是「抗共」的一羣，很快就會有更多的轉為「迎共」甚至「親共」了。

其實，兩局議員只是整個社會的縮影。君不見今次來自各方的「國慶團」當中，有不少過往以「拒共」著名的學者、報人及商家嗎！從左派的統戰角度看，確是一次輝煌的成就。到此大局已定，誰會不識抬舉地批評中英協議呢？自麥理浩79年北上，挑起97問題至今天圓滿解決，我們總算看到這一階段以大團圓結局！ □

中英談判大事表			
	日期	聯合新聞 公布摘要	備註
港督麥理浩 訪京	79年3月24日 —4月4日		麥理浩表示，鄧小平講「香港投資者放心」。 82年9月7—10日港督尤德與五名議員訪英。
英相戴卓爾 夫人訪華	82年9月22日 —26日	共同維持香港安 定繁榮，透過 外交途徑進行 商談香港前途。	在北京舉行記者招待會， 重申三條不平等條約有 效。
英相訪港	9月26日 —28日		記者招待會上，重申中英 共同維持香港安定繁榮， 透過外交途徑解決香 港問題。 83年1月21—29日尤德赴 英與戴卓爾夫人和外長 皮姆會談。 83年5月16—22日由立法 局議員李鵬飛出任團 長的各界青年團訪京， 與習仲勛進行交談。 83年7月2—11日行政局 全體非官守議員赴英， 與港督一起謁見英相。
第一回合 會談	83年7月12日 —13日	形容會談「有益 」及「有建設性」。	這是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 舉行的第二階段會談。
第二回合 會談	7月25日 —26日	形容會談「有益」。	
第三回合 會談	8月2日 —3日	無形容詞，僅說 「舉行了進一 步的會談」。	8月5日港督自82年5月 上任以來，第五次赴英， 向賀維及雷斯滙報過

			去三回合之經過，並會見戴卓爾夫人。
第四回合 會談	83年9月22日—23日	無形容詞，僅說「進行了一次會談」。	9月24—28日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次官雷斯訪港，表示英方不同意定出會談期限。 港元跌至新低點，1美元兌9.55港元，金價則攀升為每兩4,750元。 10月15日財政司彭勵治宣布自83年10月17日起，指導性匯率為1美元兌7.8港元。
第五回合 會談	10月19日—20日	「有益」及「有建設性」。	
第六回合 會談	11月14日—15日	「有益」及「有建設性」。	11月15—20日新任英國駐華大使伊文思來港訪問。
第七回合 會談	12月7日—8日	「有益」及「有建設性」，並取得進展。	84年1月12—19日尤德爵士與行政局議員訪英，與英相及外交部會談。
第八回合 會談	84年1月25日—26日	「有益」及「有建設性」。	中英談判團團長改為周南和伊文思爵士。
第九回合 會談	2月22日—23日	「有益」及「有建設性」。	2月24日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羅保提出動議：「任何有關香港前途的建議，在未達成最後協議之前，必須在立法局討論。」 2月25—28日雷斯第二次來港會見兩局非官守議員、區議員及社團領袖。 3月14日立法局辯論羅保動議。

第十回合 會談	84年3月16日 —17日	「有益」及「有 建設性」。	
第十一回合 會談	3月26日 —27日	「有益」及「有 建設性」。	會談地點改在釣魚台國賓 館 3月28日怡和宣布在百慕 達設控股公司，總部仍 設在本港，香港股市急 跌。 4月3—6日港督偕行政 局議員訪英。
第十二回合 會談	4月11日 —12日	「有益」及「有 建設性」。	
英外相賀維 爵士訪華	4月15日 —18日	會談取得可貴進 展。	與吳學謙和鄧小平會晤。
英外相訪港	4月18日 —22日		賀維在香港公開表示香港 主權將交還中國。
第十三回合 會談	4月27日 —28日	「有益」及「有 建設性」。	
第十四回合 會談	5月9日 —10日	「有益」及「有 建設性」。	5月9—18日九名兩局議 員赴英，反映意見及旁 聽國會辯論。 5月16日英國會下議院就 香港前途首次辯論。 5月22日英國會上議院就 香港前途首次辯論。
第十五回合 會談	5月30日 —31日	「有益」及「有 建設性」。	
第十六回合 會談	6月12日 —13日	「有益」及「有 建設性」。 成立聯合工作小 組。	6月21—25日行政局議員 鍾士元、鄧蓮如與利國 偉，應新華社邀請赴京 會鄧小平及姬鵬飛，並 呈交意見書。

榮耀全歸鄧小平的香港前途談判

第十七回合 會談	84年6月27日 —28日	「有益」及「有 建設性」。	
第十八回合 會談	7月11日 —12日	「有益」及「有 建設性」。	7月12—14日雷斯三訪本 港，並透露將在港設立 民意審核專員辦事處。 7月18日港府發表代議政 制綠皮書。
第十九回合 會談	7月24日 —25日	「有益」及「有 建設性」。	
英外相訪華	7月27日 —31日	為儘早解決香港 問題取得重大 進展。	
英外相訪華	7月31日 —8月1日		賀維發表聲明，透露中英 聯合聲明的十大要點， 包括香港可享有經濟貿 易政策的自主權、現行 法制基本不變及港人可 自由進出等。
第二十回合 會談	8月8日 —9日	「有益」及「有 建設性」。	
第廿一回合 會談	8月22日 —23日	「有益」及「有 建設性」。	
第廿二回合 會談	9月6日 —7日	「有益」及「有 建設性」。	
中英聯合聲 明草簽	9月26日		中英兩國談判代表團團長 上午在北京草簽聯合聲 明，並於當日傍晚在香港 發表全文。
正式簽署中 英聯合聲明	84年底		85年6月30日前兩國互換 批准書後開始生效。

榮耀全歸鄧小平的 香港前途談判

作 者	司馬義
編 輯	張健波
出版及發行	信報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四九九號 北角工業大廈四樓A座 (英皇道郵箱三四八九二號)
印 刷	信報有限公司
定 價	港幣十元正 美金二元正
初 版	一九八四年十月
封面題字	韓中旋
設 計	黃熾良

本書版權爲信報有限公司所有・不得翻印

榮耀全歸鄧小平的香港前途談判

作者：司馬義

定價：HK \$10
US \$ 2